右派分子

章乃器的丑惡面貌



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华全国工商業联合会 宣傳教育处編

右派分子章乃器的丑惡面貌
工商界月刊社出版
人大常委会机关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开本787×1,092耗1/32·印张4 7/8　80,000字
1957年8月第一版
1957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0　定价：0.30元

目　　录

前　　言

右派分子章乃器披着“进步人士”、“民主人士”的伪裝，一貫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活动；在党的整風时期，他和章伯鈞、罗隆基等右派分子互相呼应，露骨地發动了对人民的猖狂进攻，企圖把我国拖回到資本主义的罪惡老路上去。六月和七月間，我們兩会的常务委員会接連召开了几次联席会議，对章乃器进行了有力的說理斗爭，对他的荒謬言論作了严正的批判，把他的丑惡面貌徹底地揭露了出来。本書就是收集各方面人士揭露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和丑惡历史的材料所編成。从这些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出章乃器是一个怎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和丑惡不堪的人。

为了有力地对右派分子进行斗爭，必須把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和丑惡面貌尽量揭露出来，我們揭露越徹底，斗爭也就越有力，越能使广大群众認清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危害性，越能使右派分子趋于孤立。全国工商業者对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斗爭正在深入开展中，这里所揭露的材料还只是一部分，其他更重要的材料一定还很多，除了我們兩会継續徹底揭露，坚决批判，广泛收集外，希望广大讀者也能够帮助我們收集，共同为

反右派分子斗爭而努力。关于各方面人士对章乃器反动言行的批判，中国民主建国会已編印了專册，請讀者一起參閱。

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华全国工商業联合会 宣傳教育处

1957年8月10日

民建多年来是怎样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活动展开坚决斗爭的

黄炎培

我万万料不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条又一条地規定得那么明确，公布还沒有滿三年，到今天就是当时亲身参加举手通过那部無上庄严的国家根本大法的章伯鈞、罗隆基、章乃器等在人民面前敢于明目張胆地說，偷偷摸摸地幹那些和宪法絕对違反的荒謬絕倫的言論和行为。怪不得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憤怒。作为一个中国民主建国会負責人之一的我，有义务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說明中国民主建国会中間一个右派野心分子章乃器。

大家都知道右派野心分子章乃器，是在本年6月19号經中国民主建国会跟全国工商業联合会兩会联席会議决定，責令檢討的，民建是"停止会內全部职务，責令檢討"，工商联是"停职檢討"。

我现在把民建前前后后跟章乃器的斗爭情况来向大家做一个簡要的报告，讓大家充分認識章乃器丑惡的眞面目之后，和我們一道来向章乃器在全国范圍內繼續展开坚决的斗爭！

代表們！大家已經知道：章乃器在国务院会上要尽刁

滑手法，对总理口出不遜，拒絕一切批評，硬說自己很好（写在6月28日大公报上）。章乃器在四川小組会上摆出資产阶級的臭架子，出言蛮横，表現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極端惡劣态度（写在7月3日人民日报上）。代表們！那里知道章乃器这种刁滑、蛮横、惡劣在民建会場上、小組上，这些已經是“家常便飯”了。

民建許多同志曾長期和章乃器斗爭

章乃器从前在民建所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常务委員会副主任委員。他的言論在广大的工商界中是有他的一定影响的。章乃器自解放以来，曾經長期地利用他在民建的地位，对工商界散布了很多的毒素。民建許多同志曾經長期地跟他展开了斗爭。斗爭是很早展开的。到現在大家进一步認識到我們对章乃器的斗爭，簡直是兩条路綫的斗爭。章乃器不和我們同样走社会主义路綫，而竟是走資本主义路綫。

大家都知道，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一个以民族資产阶級分子为主要組成成員的民主党派。这一党派，在解放以后由于中国的革命已經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它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担負着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帮助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还在这一改造工作的进行过程中間，同时帮助民族資产阶級分子的思想改造。总之，民建接受中国共产党領导的政治路綫是一貫的。

但是，民建就在这一点上發生分歧了，主要就是章乃器。自解放以来，章乃器一貫地在民建領导層中間，跟許多同志鬧意見，鬧不团結。过去大家还不很了解他的意圖，現在回想起来，深深地認識到他跟我們爭的，除了他个人的領导地位等等以外，重点还是民建的政治路綫問題。在我們的記忆中，章乃器自解放以来，一共在民建的政治路綫問題上与我們大鬧过三次，小鬧一言难尽了。現在讓我把三次怎样大鬧簡單地說一說：

章乃器第一次六鬧不同意团結教育改造的任务

第一次是在1950年4月，那时剛解放不久，我們曾經商定把团結、扶助、教育、改造民族工商業者做会的主要任务。章乃器开头沒有異議，后来忽然表示不同意。提出的問題是“誰团結、扶助、教育、改造他們呢”？他認为“这可能被解釋为是某些先知先覚以至自命为积極分子的人們去团結一般落后的可憐的民族工商業者，去扶助、教育、改造他們”。因此他說：“民建是屬于他們（指工商業者）的。革命知識分子和青年幹部都只是为他們服务。”这样很明白，他就是不要本会在党的領导下，吸收革命知識分子与青年幹部来協助工商業者进行改造，而只要本会变成一个純粹的資产阶級政党。

章乃器在当时，一方面在北京、天津各地到处演說，提倡工商業者要努力“剝削”，並把中国資本家的“剝削”加以美化，如說中国資本家的剝削乃是沒有“剝削意識的剝削”等。一方面又在会內强調知識分子必須不耻于为資产阶級服务等等。在章乃器的心目中从来沒有民建会是在党的領导下担任对資产阶級分子的改造工作这一想法。当然，章乃器这些見解，是不可能不遭到我們会內的多数同志們的反对的。在“三反”的时候，許多同志給予

很严厉的批判，但章乃器却毫不表示悔改。

第二次大闹提出“紅色資产阶級政党”

第二次是1955年，民建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章乃器又跟我們在政治路綫問題上發生了严重的爭执。这就是当时他所提出的“紅色資产阶級政党”問題。“紅色”兩字，是代表革命的，是屬于常識范圍的。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到了社会主义的革命阶段，作为阶級来說，已經是一个要被消灭的阶級，怎么可以再用“紅色”兩字来代表它？章乃器不应該不知道，他的所以要在当时提出这个口号，显然是在他心目中，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是一个不需要改造的阶級，更談不到是一个需要被消灭的阶級。他想把中国民主建国会，看成是一个“紅色資产阶級政党”，来借此与紅色的工人阶級政党分庭抗礼，这种意圖还不够明显嗎！民建会員同志們头腦是清醒的。章乃器这个口号一提出，跟他在1950年一样，立刻遭到了絕大多数会員同志們的反对，但章乃器也依然毫不覺悟。

第三次大鬧否認資产阶級有兩面性

第三次是1956年本会召开一屆二中全会的时候，章乃器又开始提出了一系列的荒謬理論，来反对資产阶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主要就是有关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兩面性問題跟工人阶級的关系問題。

1956年章乃器在民建一屆二中全会上最初說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在全行業公私合营以后，已經沒有所謂“兩面性”了。后来又說資产阶級的“兩面性”是与工人阶級一样的。仅仅只是“先进”与“落后”的“兩面性”。此外，他又放肆地丑化中国的工人阶級，丑化共产党員，借以挑撥工商業者接受工人阶級（通过共产党）的領导。民建一屆二中全会，为此曾严正地批駁了章乃器这些謬論，並且郑重地作出决議，說明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在資本主义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营后依然还是存在的。虽然它的內容与表現形式已經与过去有所不同。但資产阶級与工人阶級在本質上显然还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会議更特別强調了我国的人民民主專政在实質上是無产阶級專政的一种形式。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决不能理解为与任何資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政治”有什么本質相同之处，决不能理解为我們可以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我們認为任何离开了社会主义原則的，对这一方針的曲解都是錯誤的。从今天看来，我們当时的这些論点不仅仅是对章乃器，而是对今天所有右派分子的論点，都是針鋒相对。

民建二中全会几个决議，向全体会員作了傳达后，是取得多数会員同志們的拥护的。但章乃器並不甘心于他的失敗，在二中全会后，不但仍然繼續坚持他的荒謬論点，並索性进一步地歪曲毛主席的言論，把工人阶級亦說成还有兩面性的阶級，借此来混同資产阶級与工人阶級之間的区别，不承認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改造是“脫胎換骨”的改造。当然，章乃器的所以要在資产阶級“兩面性”等等問題上大做文章，目的是在抗拒党对民族資产阶級分子的改造工作，也就是章乃器反对党的領导，这当然是由来已久的事情。但过去还比較隐蔽，自苏共二十次代

表大会后，在檢查統战部工作的时候，他的反党态度乘机暴露出来了。

党的整風运动开始后他露骨地向党猖狂进攻

今年党的整風运动开始后，章乃器除継續散布过去原有的許多荒謬論点外，还更加露骨地对党猖狂进攻起来。如他在人民日报上所發表的"从'牆'与'溝'的思想基础說起"一篇文章中間，公然地曲解斯大林所說的党員乃是特殊材料造成的話的本意，在实質上反对党員乃是工人阶級的先鋒队的作用。他更提出了反对"大党主义"，反对党組織"上前台"等口号，排斥党对民主党派的領导、党对一切行政工作的領导。和儲安平的"党天下"思想，可以說沒有兩样。

章乃器不但自己反对党，还鼓动工商業者一道来反对党。裝成一个对工商業者的同情者的样子，在6月号的工商界月刊中所發表的"关于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兩面性問題"一篇文章中間，竟打起了反教条主义官僚們的旗帜，直接对主張今天的工商業者还有兩面性的党的領导同志們作了最惡毒的攻击。章乃器又在"关于工商改造輔导工作的几个問題"一篇文章中間，提出了"官僚主义是比資本主义更危險的敌人"这样的口号来一面歌頌資本主义，一面丑化社会主义。

由此可見章乃器所打算走的道路，是确确实实与我們所走的道路相反的。因为我們所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愈深入一步，愈感觉有更加着重改造自己的必要，有更加擁護党的必要。而章乃器正相反，愈深入一步，愈要起

来反对党的領导，愈要起来反对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正說明了社会發展規律，当絕大多数中国的民族工商業者都願意接受党的領导而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定会有那么一小撮人起来反对走这条社会主义的道路——而章乃器正是这一小撮人的代表。

章乃器成为右派野心分子决非偶然

根据上面所說，我們可以看出章乃器所以成为右派野心分子，絕不是偶然的，也絕不是突如其来的。过去外面的人不了解，認为民建內部長期鬧不团結、鬧宗派，今天大家明白了，完全不是別的，就是兩条路綫的斗爭，就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跟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斗爭，接受党的領导跟不接受党的領导的斗爭。在这里我要特別提出由于党一貫地正确領导和帮助，我們絕大多数民建会員包括不少工商業者，願意擁護党与接受党的領导，所以民建自解放以来，虽然在工作上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錯誤，还不曾为了受到章乃器謬論的影响，迷失了我們政治方向，甚至發生民建政治路綫的变化。这是应該向全国人民告慰的。今后敢于向大会保証民建永远跟中国共产党走。

章乃器惡劣的品質、凶狠的行为和他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使用的种种卑鄙的手法，我們正在一步进一步地揭發和分析。在这里所要說明的，只是我在参加了对于像章乃器这样一个右派野心分子的斗爭之后，有一点新的感悟，就是：我过去囫圇吞棗地只記住了"团結、批評、团結"这个原則。現在我进一步体会到毛主席新的指示"从团結的願望出發，經过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决，从

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結”。这点值得細細回味。什么叫做“新的基础”呢？从民建一大群会員同志們長期跟章乃器斗爭，总無法达到团結这一件事情看来，这达不到的“新的基础”，就是共同的政治基础。彼此走的路綫已經是兩条了，还会达到共同的政治基础嗎？毛主席报告中間还有一句精辟的指示：“沒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沒有灵魂。”大家想：灵魂都沒有了，还能和他建立共同政治基础嗎？还能和他团結嗎？民建同志們多少年来为了章乃器，前前后后，不知用了多少忍耐工夫，多少說服方法，終于达不到团結，現在得到毛主席的指示了。代表們！在座不少友党、友团，有的正在展开整風工作，有的和我們民建同样地正在打击右派野心分子，民建願把这斗爭經驗傾筐倒篋地貢献出来，讓大家参考。

对章乃器展开的斗爭是反右派斗爭中的重要一环

章乃器問題，乃至一切右派分子問題，已經不是什么个别的人的問題，而是我們国家內部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間出現了一小撮反社会主义、反党的小集团的問題。这些右派分子实际上是彼此在互相呼应、互相支援的。就章乃器来說，他公然支持儲安平，公然要章伯鈞“不投降”，一切都写明在报紙上。这就說明我們今天对章乃器所展开的斗爭，就是整个反对右派斗爭中間的重要一环。

現在以章乃器为代表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是已經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但在他影响下的右派分子，各地依然存在着。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在全国范围內將这一反右派的革命斗爭，繼續扩大展开，

徹底地进行下去。这是一場严肅的阶級斗爭，我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民群众，站稳立場，坚決地参加作战，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原載7月12日大公报）

章乃器的反动本質何在？

孙 起 孟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各項报告。現在我就反击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的問題發表一些意見。

右派分子的本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从政治上、思想上看，右派分子的本質是什么？概括地說，他們的本質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反对党的領导。右派反人民，就在这兩条根本的东西上反；人民反右派，也必須在这兩条根本的东西上揭露他們，回击他們。最近以来，右派先生們似乎开始有一些"自我批評"的精神，似乎他們很願意戴上像"学習不够""自由主义""資产阶級个人主义""自高自大"等等一类的帽子，唯有对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兩条，却死不認賬。很可玩味的是，在6月25日同一天晚上，一个右派領袖叫罗隆基，在民盟的会議上宣称，把他的骨头燒成灰，也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另一个右派領袖叫章乃器，在国务院的会議上也作了連詞句都几乎同罗隆基完全一样的自白。他們的这种高度的一致性是不謀而合的，还是謀而合的，我們可以不去理会，对于我們認識問題有帮助的是，他們所最忌

諱、最想遮遮掩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正是右派最本質的东西，这一点更加可以肯定無疑了。

右派先生会辯解：他們不都在口头上，文字上表示过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嗎？憑什么能够断論他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是的，他們不仅表示过，而且在为全国人民已經揭露为右派分子的时候还在繼續表示。他們一定要这样地繼續表示，那有什么法子呢？他們有充分的表示的自由。不过，一个人的政治立場，畢竟不是靠表示来作决定的，完全要靠事实和行动。大量事实戳穿了右派分子的伪装，揭露了他們的眞相：他們的表示拥护党，是为了便于反对党，他們的表示拥护社会主义，是为了便于反对社会主义。在这里，我想举章乃器为例，限于时間，仅仅只能就这个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論和手法这一方面，向大会提供若干材料。

章乃器的反党是一貫的、陰狠的，他使的是明槍加暗箭

章乃器的反党是一貫的、陰狠的。我們不必追溯很远，只需把建国以来，特別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的某些言論分析一下，就可以看清楚他的反党的眞正面目。他的反党确是有"独到"之处的，他所採取的是釜底抽薪的办法，也是杀人不見血的办法。他的办法就是用尽千方百計去歪曲、汚蔑，否定党关于資产阶級的根本理論、政策，恬不知耻地、無孔不入地販运他的美化資产阶級的論調，从阶級基础的立脚点上根本否定工人阶級的領导，否定党的領导。章乃器的否認資产阶級兩面性的反动观点，

現在已經在全国人民面前破产了。可能有人以为这是他最近的主張，或者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引起的一时的錯觉。不是的，早在1951年6月，他就說过：“經过一年多新时代的教育，他們的兩面性动摇性已基本消除了。如果我們还把解放初期甚至在反动时代的眼光来看他們，就不符事实了，不适当了。”这个論調曾經在民建会內的“三反”运动中受到严正的批駁，因而沒有在工商界、社会上發揮多大的消極作用。据我們后来了解，党也曾对他的这些論調进行批評，劝勉他改正錯誤。假使他真正是接受党的領导的話，假使他真正只是思想糊塗的話，此后他就应当改弦更張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他后来一直沒有放棄斗爭。1956年，民建会召开二中全会，章乃器又利用这个时机宣傳更为猖狂、更为系統化的荒謬主張。如資产阶級沒有阶級兩面性，肯定資产阶級是革命阶級，工商界要进行思想改造，必須先向資产阶級的典型人物学習，而不能学習工人群众的优良品質，不如此工商界就“会感到無所适从和接受不易”等等。会議之前，他曾經得意洋洋地說：“有些問題可以耐心等待，时間是可以解决問題的”，以为斗爭准能胜利，可惜得很，他这一套的命运並不見佳，正相反，在与会者的一致痛駁之下，他只有把自己在政治上陷于更加狼狽的境地。在这次会議的前面、中間和会后，民建会的同志不断地向他进行了团結教育的工作。如果他仅仅是在認識上有些錯誤或者有些右傾，經过上述的批判斗爭，他应当完全改变自己的看法，同一次又一次向他伸出团結之手的同志們一道站到正确的立場上来。事实証明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另有自己的政治路

綫，並且坚决地为之而斗爭。在那次会議結束之后，他还用書面發言的方式吹起繼續战斗的号角，說什么“同志們！請原諒我，我絕不能代表民族資产阶級軟弱性和动摇性，党热烈期望我們大家都坚强起来，不要再有軟弱性和动摇性！”真是活見鬼，难道党会期望資产阶級“坚强起来”，不承認有兩面性，坚决抗拒改造嗎？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請託过章乃器这样去号召資产阶級的！他的这种反党的政治立場，在1957年2月毛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以后，就再也掩盖不住了。毛主席报告中的第四个問題“工商業者問題”的主要論点，明明是針对着章乃器之流的荒謬主張进行批駁的，这一点，章乃器不会不明白。如果仅仅是認識問題，如果他的心目中还有党和毛主席的一点影子，这个时候他总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主張加以改变了。但是他在这样重大的政治問題上不仅絲毫沒有接受毛主席的教导的意思，反而在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加速了他的向党进攻的步調，尤其令人憤慨的是他惡毒地歪曲毛主席的論点，把他自己的資产阶級只有同工人阶級一样的先进和落后的兩面性的反动論調公然說是毛主席的主張，並且写成文章，公开發表来蠱惑工商界。大概是党号召鳴放以后，章乃器的头腦特別發脹了，因此謬論層出不穷。这一方面，別位代表講得不少，無需重复。应当指出的，这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同整个右派利用帮助党整風的时机向党猖狂进攻的全部活动联系起来，章乃器的这种反动論調的發展，而且急求“出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的这一方面的反动活动正是整个右派全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中間

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大家看一看他的挖党的領导的牆脚，是多么“巧妙”，因而也是多么惡毒啊！他並不像葛佩琦之流那样笨拙地正面点破，而是“意味深長”地令人按照他的路綫去發展反党的言行。資产阶級同工人阶級既然沒有什么区别了，看你工人阶級还領导个什么！資产阶級一样是个革命的阶級了，要說有兩面性，工人阶級也有兩面性，这样，資产阶級为什么还要接受工人阶級的領导？由此可見，他是在最根本的地方反对党的領导，搞垮党的領导。为了掩护，他有时碗也不能不說几句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違心之論。例如，他最近說过不止一次的“我爱护党中央同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就是为反党打掩护的烟幕。謝天謝地，亏得党並沒有接受这样的“爱护”，因而眼睛明亮，終于看穿了章乃器是个右派分子。他的所以放出这些有毒的烟幕，目的在于使劳动人民失掉警觉，解除武装，以利于右派分子以及其他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各位代表，这是無論如何不能容許的。对党进攻，葛佩琦之流使的是明槍，章乃器使的是明槍加上浸透了毒药的暗箭。对于一切危害党的明槍、暗箭，我們都必須把它們揭露开来，而且徹底、干淨、全部地加以消灭！

章乃器怎样露出了狐狸尾巴？

人們可能要問：章乃器的反党，难道完全不露声色？那也不是，馬脚有时还是要露出来的，特别是在他近期的言論和活动之中，狐狸尾巴就露得更多一些。限于时間，在这里只說下面几点：

第一、中共举行“八大”会議，这是我国人民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民建会的地方組織都期待着民建会中央紧接在“八大”会議以后作出学習“八大”文件的部署。但是，在别的民主党派發出布置学習的通知的时候，民建会中央还是毫無动作。問題出在那里呢？問題就出在章乃器的反对和阻撓。那时在京的民建会中央負責人都認为有必要早發通知，独独到負責宣教工作的章乃器那里却卡住了。章乃器認为号召学習“八大”文件是形式主义，强調应当批判形式上的歌功頌德、拥护、号召一番。后来在民建会中常委会議上有人批評了迟發通知的这件事情，章乃器还气势洶洶地反唇相譏說：这是表現着資产阶級的竞爭性。他並且接着借題發揮，对党、对統一战綫大肆汚蔑了一通，說什么民主党派的暗流是十二个字：爭权夺利、趋炎附势，阿諛奉承；說什么有些人看見党員要低一等，对党員無原則的奉承，而且那种样子很不美丽；說什么党与非党都是平等的，中國只有一級公民云云。这是章乃器的反党尾巴露得比較長的一次。从上面的話里，我相信各位代表能够想像得出章乃器对党那副深惡痛絕的神气来。

第二、章乃器長时間以来到处点火煽动人們，特别是煽动工商界向党进攻。他用的一句含义無穷的口号是：要抬起头来。記得榮毅仁代表在听了他的話以后曾經补上一句，說头要抬起来，尾巴可不要翹起来。我看这还不是章乃器的本意。章乃器这句口号的实質是：資产阶級抬起头来，工人阶級低下头去，共产党低下头去。工商界中听了章乃器的煽动以后，也有想不通所以然的：工商業者到底在那些方面抬不起头来呢？要怎样才算是抬起头来呢？唯恐有些工商業者不懂得其中奧妙，于是章乃器又出了点

子：你們不是还有自卑感嗎？人家不是还在說你們有消極一面嗎？你們的自卑感和消極从那兒来的？还不是"五反"造成的？你們不是有职無权嗎？要知道，像我章乃器这样常見毛主席周总理的人，当粮食部長有职有权，是全靠斗爭得来的。意思是，你們不斗还行嗎？唯恐这样的点火还不够，章乃器在最近的一篇文章里惡毒透頂地煽动道："教条主义者一貫低估民族資产阶級的进步。應該看到，八年来，他們經常在阶級斗爭的火綫上，飽經了斗爭火焰的洗禮，这对于他們的教育和煅煉是十分深刻的。这种火焰轉到了某些教条主义的官僚面前的时候，已經变成了温室中的暖气，成为教条主义官僚們的享受。"这里充滿着污蔑我国和平改造政策的反动的阶級仇恨，这一段話使我們清楚地听到章乃器对于党的咬牙切齿之声，把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方面的工作人員描繪成吃人的魔鬼一样，这不是反对党，挑撥工商界向党进攻是什么？更加惡毒的是，他自己一面在拼命点火，一面又大肆宣傳阶級斗爭熄灭的論点，企圖使劳动人民完全陷于麻木不仁的境地，好使他們猖狂进攻，为所欲为。早在去年十一月，他就發表过这样的謬論："我体会到，党所要求的扩大民主生活的尺度是远远超过某些同志的看法的。我所理解的党的看法是这样：扩大民主生活，並不会削弱集中，而只会有利于集中……應該相信，尽管扩大民主生活，在我国也出现不了政治路綫上的反对派"这些言論，完全是为右派的活动鋪平道路。到了今年六月，章乃器进一步宣傳起敌我不分的論調来，他說："教条主义者連我們祖先不断告訴我們的'化敌为友'的教訓都忘記了。他們死啃'存在

决定意識'的法則，然而是'鼠目寸光'，看得很小很近，而且不掌握客观形势的發展"。在这里，章乃器的言論就簡直在为反革命鋪平道路了。一面到处大点其火，一面高唱"化敌为友"，我們要問一問章乃器这一位自称"愛护党中央像愛护自己眼珠一样"的右派分子，你到底要搞些什么名堂！

第三，章乃器在今年5月14日發表的"从'牆'和'溝'的思想基础說起"一文中也有比較露骨的反党的东西。例如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說的："因此，我觉得，在'拆牆'和'填溝'的工作中除了要做好其他許許多多的工作以外，批判共产党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条教条是必要的。如果党在檢查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之外也檢查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在另外一段中，章乃器这样說道："党組織有如戏剧的編导，其他国家机構有如演員、艺术技术人員和管理人員。編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艺术技术人員和管理人員。……以人民鬧事为例，如果先讓行政負責处理，党組織加以指导和支持，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来作解釋和說明，事情就可以处理得更好一些。如果一开始就亲自出馬，处理得好固然沒有什么，处理不好就鬧僵了。"这兩段里有特別露骨的惡毒的反党的东西。值得特別提出的是他所"創造"的对党極端污蔑的"大党主义"，而且根据章乃器的估計，"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我們要質問章乃器：你所說的"大党主义"指的是什么？你所說的"大党主义"不是反对党的領导是什么？国与国之間，民族与民族之間，是沒有什么領导与被領导的关系的。沒有領导与被領导

关系的，尚且要除在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依章乃器看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别的党派在政治上竟然居于領导地位，这样，共产党的"大党主义"是命定了的，是断然改不好的。要去掉"大党主义"，除非是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領导地位。說得真"妙"！我章乃器是在帮助党改正錯誤呀！我是在帮助党"拆牆""塡溝"呀，党要是願意去掉情况很严重的"大党主义"的話，那么，請考虑考虑改变自己的領导地位吧。不然的話，"牆"是拆不掉的，"溝"是塡不平的。要党檢查"大党主义"，这样，章乃器的反党的狐狸尾巴就清楚地暴露出来了。章乃器的这种論調，和儲安平的"党天下"实質上完全是一回事。正是由于这样的一致性，在別人批評儲安平的"党天下"的謬論的时候，章乃器却要公开为他辯解說："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說离开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在另一段中，章乃器主張党当戏剧的編导，不要上前台，特别耐人玩味的是劝党对人民鬧事的处理不要亲自出馬，"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来解釋和說明"，而且还以恫吓的口气說，"处理不好就鬧僵了"。請把这一段話同另一右派分子章伯鈞的論調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这兩个右派头子（"宗兄"和"宗弟"）的估計和看法实質上是完全相同的。章伯鈞認为："沒估計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錯誤，现在的問題大大超过了估計，（章乃器：以人民鬧事为例）眞是'超額完成了任务'，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章乃器：处理不好就鬧僵了）現在我們民盟有責任要帮助党，大有'收拾殘局，舍我其誰'之概"。（章乃器：人民鬧事，要先讓行政負責处理，党組織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馬。）（章伯鈞的話，見1957年7月4日人民日报所載："章伯鈞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議"一文）总之，章乃器的意見是：人民已經鬧事了，請党到后台当編导去吧，前台有我們呢。如果党要出馬，事情鬧僵了，可別怨我言之不預也。請看：这不是露骨的反对党的領导是什么？

第四，集中地向中共統战部門开火。不少民主人士在帮助統战部整風中提出了很多的批評和意見，大部分人提出这些批評和意見只是为了帮助統战部在貫徹党的路綫中改正缺点和錯誤，把工作作得更好。对于統战部的政治路綫是沒有什么怀疑和意見的。章乃器則不然，据他說，統战部"缺点的形成，是同不承認人民內部有矛盾的錯誤看法分不开的。"这短短的一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統战部在政治路綫上犯了錯誤了。而且他說得故意含糊其辞，使人可以發生兩种都是合乎他的期望的錯誤理解：一种是党的路綫是正确的，統战部則是执行了另外一条錯誤的政治路綫。但是党中央和各級党委对于統战部这样严重的錯誤都不加糾正，那也是犯了不可救藥的官僚主义。另一种是統战部执行的就是党的政治路綫，那么，不仅統战部的路綫是錯誤的，連党的路綫也是錯誤的。这是章乃器对党的極其惡毒的污蔑，这是他否定党的領导的另一种比較露骨的手法。

各位代表，根据以上的材料，章乃器的反党难道还不够明显嗎？难道还需要如他所說的，观察若干年，甚至等他死后化骸骨灰才能下結論嗎？在这里我們要以章乃器批評別人的話回劝章乃器：你不要搞什么神秘主义了，还是

在揭發出来的大量事实前面，立即对自己的反党活动，老老实实地作出交代吧！靠耍無賴的办法闖过关去，肯定是办不到的！

章乃器的"最后"算盘到底打在什么上头？

反击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是一場極其复杂的、尖銳的斗爭。关于右派分子，我完全同意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对策和估計。"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門对他們是开着的"，但是，在进門以前，必須把自己的骯髒包袱打开，把里面的腐朽的东西丢得干干净净，混进来或者闖进来是不行的。章乃器不是自己吹嘘"心安理得，輕松愉快"嗎？不是覺得他自己比"投降將軍"坚强嗎？这是烟幕彈，这也是一种卑劣的斗爭方法。我要問章乃器：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得"的什么"理"？你在工商界人士座談会上的書面發言中号召工商界說："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你的"心安理得，輕松愉快""坚强"可能就寄托希望于这"最后"兩字上吧？党中央、毛主席說的話不算"最后"，周总理代表政府的說話不算"最后"，全国人民代表的說話不算"最后"，章乃器的"最后"算盘到底打在什么上头？应当正告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假使你們把"最后"的宝押在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以外，那么，你們只会墮入罪惡的深淵中去，这絕对不是出路而是絕路。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也可能有極少数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場，抗拒改造，甚至採取破坏社会主义建設的行动，那么，他們就將自絕于人民"。走上这条絕路，有什么"心安理得"之可言！有什么"坚强"之可言！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門是开着的，走生路还是走絕路，这取决于右派分子自己的选擇，至于全国人民的反击右派分子的坚决斗爭，决不会因为右派分子的耍些手法而改变。我們一定要同右派分子斗爭到底！我們一定要同危害党和社会主义事業的一切敌人斗爭到底！

（原載7月14日光明日报）

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惡毒手法

孙 曉 村

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各位首長的报告。

在这次大会的开会期間，全国人民正展开反击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的斗爭，各位代表都积極地参加了这个斗争，在大会和小組上除对国家事务进行討論外，还以大量的时間来批判和揭發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有的小組还面对面地对右派分子进行了駁斥。这样做，我認为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

反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爱国，章乃器的爱国是假的

在这一小撮的右派分子中，章乃器是一个最善于偽裝的分子，一直到最近一次的四川小組会議上，他还說他"只是有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政治上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关于他怎样反对党的領导，在我前面發言的孙起孟代表已对他作了严正的批判，我在这兒只想就章乃器如何反对社会主义，如何使用惡毒的手法，以及他的言行所造成的危害向大会揭露。

章乃器怎样反对社会主义呢？他一貫地否認剝削，为剝削辯护，把剝削說成理直气壮的事。他在解放后的头几

年中發表过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对工人阶級的剝削是沒有剝削意識的剝削的"妙"論，鼓励工商業者努力剝削。現在又說定息不是剝削，是不劳而获。这一切說明，章乃器所努力奋斗的不是消灭剝削，而是保持剝削。既然过去的剝削是沒有剝削意識的，而現在的有限制的剝削又不是剝削，所以从章乃器看来，資产阶級分子与工人沒有本質上的区別，資产阶級分子的改造（实質上是由剝削者轉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改造）当然不是本質的改造，同工人阶級的改造沒有不同，当然用不着脫胎換骨了。不但这样，章乃器还認为工商業者交出企業而"無所留恋"，是大公無私的品質的表現，比赤手空拳，喊口号，貼标語的人高明得多。这就是說，章乃器簡直不知有剝削这件事。順着这样的邏輯發展下去，章乃器自然对社会主义深惡痛絕而对資本主义則情不自禁地加以頌揚，終于說出了"官僚主义是比資本主义更危險的敌人"的謬論。大家都知道，章乃器也知道，历史上有过，現在也还存在着資本主义社会，但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什么官僚主义社会，因为官僚主义只是人剝削人的社会制度中的工作作風，它不能离开社会制度而独立存在的。章乃器謬論的真正內容就是社会主义不如資本主义。更加可以証明的是，他在說这句謬論的同时，大談現代化的資本主义的企業中的效率比我們的社会主义企業甚至国家机关的效率来得高；又說資本家有一种企業心，会精打細算，要一个人做三个人的事；把社会主义制度說得灰溜溜的，沒有什么优越性。我要責問章乃器：你对我們国家在全行業公私合营后把私方实职人員全部包下来，知道不知道？我們社会主义国家办

企業，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要照顾工人的健康与安全，你知道不知道？对資本主义社会中資本家在提高效率的美名下殘酷地剝削工人，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不惜毀坏棉田，把粮食倒在海里，以至發动侵略战爭等，你知道不知道？对于这些，你为什么絕口不談，各位代表，章乃器这样美化資本主义，丑化社会主义，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是什么？

正因为章乃器这样敌視社会主义，所以他的爱国的招牌也是假的，今天，任何人只有採取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場才能爱国，反社会主义的就决然不可能爱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章乃器所主持的上川企業公司在解放后表面上是停止業务，但仍有办公处，仍有职員，据最近所揭露的，仍有一些業务活动。而章乃器却用許多方法把这些業务活动隐蔽起来，逃避政府的工商管理，逃避应繳納的稅款，到結束的时候，甚至也不向政府甚至股东报告賬目。請問，这与爱国守法的行为难道有什么相同之处嗎？

他千方百計挑撥离間工商界对党和政府的感情

为了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章乃器不惜使用各种恶毒的手法。一种是偷天换日的手法，例如故意歪曲毛主席的話，把党关于資本主义工商業社会主义改造的許多論点誣蔑为教条主义，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馬列主义者”等等。一种是欺騙麻醉的手法，例如口口声声說自己是为了“千方百計地發揮工商業家的积極性”，是“站稳工人阶級的立場”，說工人阶級与資产阶級的区别“只能是先进与落后的区别”等等。一种是挑撥煽动的手法，章

乃器使用这种手法有“独到”之处，可以說極尽挑撥煽动的能事。例如，一談到兩面性，章乃器就故意說工商業家所熟知的兩面性是政治上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兩面性，和經济上有利于国計民生的积極的一面与不利于国計民生的消極“五毒”的一面，其实从来沒有人說高潮以后資产阶級还存在有兩面性是这样的內容，章乃器故意給人栽上，为了挑起工商界的情緒。所以他接着又一再發問：“难道还会重施‘五毒’？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用心的恶毒，可以想見。人民日报社論中提到工商界要进行脫胎换骨的改造，章乃器就說：“现在工商界又經过了五关，……如果还要脫胎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無穷的憂虑，如何能不消極自卑？”談到工商業者的改造时，章乃器还动輒以地主来相比，甚至說：“只要根据先法規定，給工商業家以平等公民的待遇，他們是可以少安毋躁的。”意思是說工商業者在新中国沒有享受到平等公民的待遇，甚至比地主都不如。这样的例子可以列举很多，总之，章乃器千方百計地所做的，就是挑撥离間工商界对党和政府的感情，鼓动工商界不要跟着共产党走，不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他的謬論使一些工商業者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后退

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發生了什么影响呢？由于章乃器是集中地代表了資产阶級消極落后的一面，所以他的言論在工商界中是有一定市場的。整風期間，章乃器的文章、發言一篇一篇地發表后，有一些地方的工商界業余政治学校、短期講習班的工作發生了很大的困难甚至

形成半瘫痪的狀态，許多学員認为課本是教条主义，只有章乃器的文章才值得学習。在章乃器的謬論的影响下，工商界中有一个短时期曾經出現过思想混乱的狀态，有些人就是不願意听"改造""剝削""劳动""資产阶級思想"等名詞，一听到就冒火，認为工人阶級沒有什么可以值得学習的，認为合营企業中不必再提阶級关系，甚至認为公方代表可以撤出。这种混乱的思想以及驕傲自滿的情緒發展的結果，使工商業者放松了自我改造，使有些合营企業中的公私共事关系由好轉坏，使工商業者在劳动人民心目中的观感也驟然下降，总之，使有些工商業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是前进而是后退。章乃器口口声声說他的动机是"善良"的，但效果如何呢，从这样的結果来檢查动机，我想沒有人会承認章乃器的动机是为了社会主义的。

他运用"攻心为上"的策略夺取民建和工商联領导权

但另一种效果却明显地产生了。那就是有些工商業者認为章乃器才真正是他們的代表人物，是他們这一阶級的"英雄"。有的人說："下次选举时一定要选章乃器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業联合会的主任委員，再也不选黃炎培和陈叔通了。"吳大琨同志批評章乃器、葛佩琦、王德周等右派分子后，曾接到恐吓信，信中称章乃器等为"同志"；黃炎培副委員長批判章乃器后，也接到类似的信件，不同意他对章乃器的批評。

从这种效果来檢查章乃器的动机，那末眞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原來章乃器是利用他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中的領导地位以及国家高級幹部的身分，以

表面上看起来是合法的方式，来进行实际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利用工商業者还有消極落后的一面，运用攻心为上的策略，在工商界中扩大他的政治影响，以便不露痕迹地（当然，他的痕迹还是被揭發了不少，現在还在揭發中）夺取民建和工商联的領导权，实現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全部企圖。章乃器說他只是思想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正是这策略的一部分。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右派分子的任何把戏都無法逃遁的。

我要正告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必須徹底交代，低头認罪，社会主义大門还是敞开的。如果狡猾抵賴，頑固抗拒，那就是自絕于人民，你們一定会被历史的車輪压得粉碎！

（原載 7 月19日人民日报）

打开章乃器的历史看一看

胡 子 婴

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章乃器，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檢討”，不是“檢討”，是强辯，是掩飾，是誣蔑。他的“檢討”，正如7月16日人民日报社論所指出的“一望而知是还沒有交代悔改的誠意。”

他在“檢討”中洋洋得意的說：“也依靠我那不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才能脫离泥坑，走上革命”。他又說：“那能設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計的威胁利誘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那能設想，一个在資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業已經取得如此輝煌胜利的时候，反而要反社会主义；”他总是企圖利用他的一段抗日救国的历史来掩盖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活动。他既然这样喜談自己的历史，我們就从他的历史上来看一看是不是如他所說的一样。

和特务头子戴笠流氓头子杜月笙同流合污

先談他的“不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的說法。举兩个例子来証明他的謊言。他是从学校里出来就进銀行学生意，一直做到銀行的副总經理。工資由每月四元到一百五十

元。在当时銀行里做事的人，一般是近水楼台，进行投机，公債、标金、花紗、外匯，什么都做。这是当时一般銀行高級职員的“濁流”，他有沒有“合污”呢？看看他当了銀行襄理、副理之后的生活情况，就可以得出結論。他有一所住宅，有一輛小汽車，每月开支比他的薪水大几倍，而他个人的开支又比家庭的开支大上二、三倍，每夜要赶几个跳舞場，过灯紅酒綠、紙醉金迷的腐化生活。在当时的环境中，过这种腐化生活，干投机买卖是普遍現象，不能說是他个人特有的罪惡，但他偏說“不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另一个例子是在重庆。当时他在伪安徽財政厅長下台之后，由上海銀行出資，創办了一个上川实業公司，主要經营电机、硼砂、酒精、畜牧。他任总經理。上海銀行的这个上川实業公司是因他所請而創办的，也符合当时一般銀行亦工亦商、左右逢源的發財願望的。他与銀行起初的合作，水乳交融，頗称投机。他既要任經理，就应該有投資，他大約投資10%（或5%我記不得了），当时付二成，八成向銀行抵押。这是銀行对他的照顧。但是合作不久，即生分歧，他和上海銀行派来的副經理經常鬧糾紛，銀行为息事宁人，曾数易其人，但总得不到他的合作。同时，他也不想再經营当时非常艰难困苦的工業生产，想去經营当时容易賺錢的商業。可是他沒有資本，也沒有条件另找合作投資人。于是他蓄意拆股，但苦無借口。正好他到貴陽和楊美真結婚，上川实業公司的業务由上海銀行派去的副經理当家。待他去了貴陽几个月回来之后，發現上川实業公司的經营，触犯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經济法令，他就乘此机会，要挾拆股，而所用手段真是

無耻之尤。他將上川实業公司的股册和管賬的人移出上川公司，另地禁閉，一面他又通过他的表弟特务叶燕蓀，勾結重庆衛戍司令部稽查处，包圍了上海銀行（或大業公司，是上海銀行投資的一个商業組織）。如果上海銀行不答应他的拆股，他是打算捕人的。結果，上海銀行在他的威胁之下，召开董事会，同意他拆股。后来他新組織的上川企業公司，他投資五万美金，佔了全部股金的一半左右，就是这样得来的。他当时这一行动，美其名曰不願再和投机倒把、違法乱紀的上海銀行合作，实質上是利用当时国民党反动統治的特务組織，进行流氓式的敲詐，是和特务头子戴笠、流氓头子杜月笙之流同流合污了。但他在"檢討"中偏說"不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眞是大言不慚，恬不知耻。

在敌人威胁利誘下就主动投降

我們再来看一看他說的"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計的威胁利誘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和"一个在資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是怎样的"不肯反共"，是怎样的"追求社会主义"的。

当他因抗日救国和其他六位救亡运动領导人被捕入獄之后，他不仅要吳大琨用化名写文章，替他宣傳他的一套为金融業服务的才干（吳大琨沒有給他写），来討好国民党，減輕他的政治罪名；他还要我去找陈誠手下的紅人、他的同乡兼同学赵淳如（又名赵志堯），向陈誠說情。我当时就覺得七个人同时入獄，为什么进行个人的出獄活动；但他对我說，七个人中有一个出獄，其他六个人入獄

情况是一样的，也可以援例要求釋放。結果因双十二事变未果。但过了几个月，情势緩和之后，赵淳如曾經到苏州看守所去探望过他，到底談些什么，我不在場，不得而知。从这一事例說明他在"敌人千方百計的威胁利誘之下"，是如何的沒有政治立場：这一活动，实际上就是投降。他出獄一个月，就写"少号召、多建議"，向国民党反动政权表明心迹，也不足为奇了。

謾罵共产党，投降国民党

他的"少号召、多建議"的文章，是主动的迁就和投降国民党。文章的技巧是非常高明的，沒有政治經驗的人是看不出他的陰謀詭計的。当时的历史情景是蔣介石虽然被迫抗战，但他依然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單純政府的片面抗战。我們知道蔣介石怕人民起来甚于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人民起来，他的一党独裁就要垮台。可是沒有群众参加的片面抗战，会引导战爭趋于失敗。但蔣介石宁願抗战失敗，也不願开放群众运动。共产党当时看出情势不妙，在8月中央政治局会議就作出决議，分析了当时国民党片面抗战、統制民众运动对抗日战爭帶来的危險性。共产党当时号召："要爭取抗战胜利，必須發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發动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必須貫徹抗日救国的十大綱領"。因此，在国民党反动統治地区，共产党員的群众活动，和国民党特务控制群众組織的現狀，就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斗爭。就在这时候，章乃器在上海申报上發表了"少号召、多建議"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說："在国策已經确定的今日，我們应該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

極的建議，使国策可以早点充实起来。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政府既然已經有了确定的国策，有点心肝的人，誰还願标新立異以鳴高？大家应集中力量培养力量之不遑，那能再存彼此派别之見，在明爭暗斗中再消耗一絲一毫的国力。”“对于民众組織方面。我們現在用不着而且不应該再提出开放民众組織的政治号召”。他就是这样公开的駡共产党“沒有心肝”，駡共产党开放民众組織的政治号召是标新立異，是“派别之見”，是“消耗国力”。在軍事方面他說：“一时一地的攻守进退，是軍事当局的职权，人民是沒有理由責問的”。在經济方面，他說：“目前已經施行战时的金融政策了，不必再来一套聳人听聞的战时金融政策以扰乱人心”。他就是这样無微不至的为国民党独裁統治护道。他还要进一步說：“我們为民族利益，不能不多信托一些政府，使他能够运用較大的权力，同时保守較多的秘密。我們要求民主，但是决不能馬上夢想一个典型的民主”。这与他現在說的“我在粮食部的有职有权，是用斗爭得来的”相比，是多么不同的心情。他又說：“我只能發表一些平淡無奇的里弄組織和职業組織的建議，消極的使后方秩序可以安定，积極的使民众对前方援助可以作有組織的动員，同时，許多青年在‘沒有工作做’的呼声之下沉悶着，也可以得着一条可以做工作的康庄大道”。他这样号召被国民党統治得“沉悶着”、“沒有工作做”的青年，去搞里弄組織和职業組織，不仅与共产党动員全民抗战的号召相对抗，而且为国民党的后方做好政治綏靖工作。他如此明显的反对共产党，維护国民党，但他在檢討中却毫不知耻的說：他是一个“在

黑暗时代里，在敌人千方百計的威胁利誘之下，都不肯反共的人”。当时的国民党並沒有对他威胁，倒是他自动的提供了“利誘”的暗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反共”是他出任伪安徽財政厅長的另一政治資本。

組織資产阶級政党，硬說追求社会主义

1945年，抗日战爭結束，他發起組織民主建国会，在民主建国会的机关刊物“平民”創刊号的發刊詞中他写着：“中国的平民，向来不要过問政治，認为政治只是那些大人先生們爭权夺利的把戏。但是大人先生們的爭权夺利，無論是和平榨取，和平分贓，或是暴力搶夺，軍事斗爭，結果被牺牲的总是多数平民。当前的內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把当时国民党的反动“剿共”，和共产党的革命軍事斗爭，等量齐观，“是大人先生們的爭权夺利”，看成是軍閥的混战。接下去他又写着：“目前国共兩党的軍事冲突，还在継續进行，国共兩党的团結合作，还有重大阻碍。要使他們的軍事冲突立即停止而且永远不再發生，要使国共兩党能够誠意团結，亲密合作，必須有中間派的政治力量的产生。民主建国会虽然剛才成立，但其性質也是一种代表中間派的政治力量。我們認为中国需要这样的一种政治力量，而且相信这样的一种政治力量有不断發展的可能”。他又說“我們願以純潔的平民的協力，不右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他發起的民建会就是代表“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派的政治力量，是为“平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政治团体，企圖在国共兩党之外走第三条路綫的資产阶級政党。

这里所謂“平民”，实际上就是民族資产阶級。但他偏叫平民，这也是他模糊阶級意識的手法。当时民建会員，也是以民族資产阶級为基础的。民建会是資产阶級政党如此明显，但他在檢討中却說：他是“一个在資本主义社会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这不是睜着眼說謊是什么？

是光荣，是丑惡，請人民判断

我平心靜气的分析章乃器，他在救国会时期，推动蔣介石抗战，和其他救国会領导人一样起过一些作用的；在組織民建会成为中間派的政治团体之一，起了一些孤立蔣介石的作用。这些作用，都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一点积極意义的。但是另一面他又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他与章伯鈞羣的七分反共，三分反蔣是同样情况的。这七分反共就是他的黑暗面，是需要改造的，但他根本沒有改造，还發展了他的个人野心。章乃器妄想將过去的“历史”来掩飾他現行的反动活动，但他忘記了过去的历史虽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起过一些極微的积極作用，但根本談不到“在資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也並沒有“在敌人千方百計的威胁利誘下，都不肯表示反共”。而他恰恰在敌人威胁过后反而明目張胆的表示反共。在国共兩党軍事冲突胜負未定之际追求資本主义。

人民是不想算历史的旧賬的，但右派分子章乃器，不仅陰謀走历史的回头路，而且还要以过去的历史来炫耀自已。这是自欺而欺人。那末就打开历史看看吧，是光荣，是丑惡：請人民来判断！　　（原載7月23日大公报）

我所了解的章乃器

胡子婴

右派分子章乃器，抗日战爭之前参加过救国会，从1935年到1937年，他写过很多有关抗日救国的文章，救国会的七人之獄，他也是其中之一。他在人們的記忆中，有較好的政治影响。解放之后，他参加第一屆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現在还是第二屆人民政治协商会議全国委員会的委員，又是全国人民代表，粮食部部長。6月19日之前，他一直是民主建国会的負責人之一，也是全国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員。6月19日兩会的常务委員会联席会議因他利用帮助党整風的机会，进行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因而作出决定，停止他兩会的一切职务，責令他檢討。

这一决定在报上發表以后，曾經有个别的知識分子和我說：章乃器沒有被說服之前是不会做檢討的；也有人和我說：你去劝劝他吧，他是很能幹的，这样下去对他很不利，怪可惜的。以上这兩种說法都出之于与他不甚相識的知識分子之口，但却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都沒有認識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危害性，都为他个人的“才华”所迷惑。說这样話的人是少数，但我認为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原因，第一，他过去抗日救国坐牢的一段政治历史，已深入人心，人們已把他当革命英雄人物看待；第二，他确是

有一点才华，善于辞令，善于文笔，与他不甚相識而听他講过話，看过他的文章的人，是很容易引起爱才之心的；第三，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論，是比章伯鈞、罗隆基等隐蔽得多，沒有那种“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会”等等論調的明显，人們不容易識別他的反动本質。但从少数知識分子的这种反映也可以看出他比章伯鈞、罗隆基等的手段更陰險，更毒辣。揭露他一貫的反动本質，使大家認識他的真面目，实在是非常必要的。

他的反动本質是一貫的

要識別章乃器的反动本質並不很容易。我和他有过十多年的共同生活，应該是比較熟悉他的，但由于我和他共同生活期間，正是他政治上表现較好的一段时間，在我的記忆中也保留着一段較好的印象。同时也由于我存在小資产阶級的思想感情，感到反动兩个字簡直与章乃器連不起来。在这次人民日报社論揭露他的反动本質之前，我对他的認識，也仅止于他是一个剛愎自用，个人領袖欲非常强的人。为了滿足他的領袖欲望，他常常不擇手段。他所到之处，总是制造糾紛和不团結。他只能听悅耳之言，不能接受合理的批評；个人的恩怨記得非常牢，有机会就要报复，为了个人恩怨，可以抹煞真理。他善于原諒自己的錯誤，善于巧辯、詭辯。他对自己連最起碼的是非之感也沒有，譬如他乱搞男女关系，明明犯了錯誤，却会說他是对的。他目空一切，驕傲自大，对共产党，在口头上，除了毛主席以外，其他的党員他都不买帳。他的这許多恶劣品質，我是熟悉的，也是非常厭恶的。但我只把它看做他个

人的事，而沒有認識到他在政治上的危害性。这次人民日报揭露了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質之后，我又回忆他的历史，經过分析，才認識到他的反动本質，不是突然的，而是一貫的。現在把我記忆所及，將他从历史上反党的領导的一貫性，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他的抗日救国是为了創造向蔣卖身投靠的政治資本

他的政治地位是从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得来的。当时他反蔣抗日救国，搞得轟轟烈烈。他的唇槍舌劍，都非常鋒利，确也鼓动了当时許多人的爱国热情，特別是当时的学生最崇拜他。他也曾因抗日救国牺牲了浙江实業銀行副行長的职位，最后和其他救国会的領袖共同入獄，成为有名的“七君子”之獄。他的这一段历史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历史，但根据他的具体行动，他的抗日救国行动，並沒有超出資产阶級反帝国主义的范围，並沒有半点無产阶級的立場。“七君子”出獄之后，正好是“八一三”前夜，蔣介石已經被逼抗日了。他一面在宋子文主持的伪救国公債劝募委員会里工作，一面在报紙上写出了“少号召，多建議”的文章，公开打击共产党，支持蔣介石。在他入獄的当夜，他在看守所托人打电話給我，說錢鈔在抽屜里，叫我取用，打开抽屜一看，原来是他和广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报的密碼本。他怕被搜查，示意我給他毁掉或藏过。这一系列的事实，說明在他抗日救国时，就同时在勾結軍閥反动派。同时，入獄之前，在救国会的組織中，他是經常和人鬧意見的，他同錢俊瑞鬧得最尖銳，因为錢是共产党員；其次是沈衡老，因为沈衡老当时是接受地下

党的领导的，又是救国会中大家公認的家長。抗日一开始，他剛从牢獄里出来，就公开打击共产党，支持蔣介石，並且投在宋子文的門下。他的抗日救国，也無非为自己創造卖身投靠的政治資本。

用尽心机想取得蔣介石的信任

上海淪陷，他和朋友們經过香港到了武汉，就到安徽做国民党的財政厅長去了。当时安徽省伪主席是李宗仁。他写信給我(我在香港)，說李宗仁本来要他做省府秘書長而沒有得到蔣介石的同意，所以退而要他做財政厅長，如果他不答应，变成爭地位了。因此他就托詞担任安徽財政厅長是"实逼处此"。他問我的意見如何。我当时感到他对我是真主意假商量，既答应了李宗仁，为什么还来問我的意見。在我看来，省府秘書長和財政厅長都一样，都是国民党天下的官，和貪官污吏为伍，沒有什么光彩。我到了重庆，还是和朋友們联名写信給他，要他到重庆担任工業合作协会的总幹事。我覺得工業合作协会的总幹事比做官好些。他自然沒有听从我，他连救国会的許多領袖們的意見也不接受，何况是我。后来他回到重庆，經常夸耀他在安徽理財有成績。当时他常常說，他不需要用吹牛拍馬的手段取得当局的寵爱，他是只憑他出色的才能和政績，使当局少不了他。在他入獄期間，也曾經要救国会的宣傳幹部與大理用假名写文章，为他宣傳他創办中国征信所、票据交換所等的才能，企圖向国民党送秋波，同时也希望国民党对他个人減輕政治压力。他的这些自吹自擂，实际上是招供了他是用尽心机想取得蔣介石政府对他的信任。

章乃器回到重庆后，和救国会領袖們的思想更远了。因为当时皖南事变已爆發，国民党消極抗日、积極反共的行动愈来愈变本加厉了。許多在后方的愛国人士和国民党展开了剧烈的斗爭。救国会領袖們是站在民主运动的前面的，是受党的領导的。他就和救国会領袖們鬧意見。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認为救国会应該有独立的行动，不应該跟共产党跑。而且对沈衡老成为救国会領导，他也不买帳。因为沈衡老接受了共产党的領导，使他不高兴。終于他退出了救国会，救国会也因他做了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幹事而开除了他。

想搞第三种势力，沒有办法才到解放区进行投机

离开了救国会，章乃器就失去了政治資本，于是他搞了个"新兵服务社"向国民党送秋波。但国民党沒有給他青睞。后来他一面利用胡厥文迁川工厂联合会的組織，一面利用黄任老职業教育社的群众基础，發起以民族資产阶級为基础的民主建国会。他是标明走中間路綫的。所謂"不左偏、不右袒"，他的政治主張是"政治民主化"、"軍队国家化"。他企圖在国、共兩党之外形成一个龐大的第三种势力。他的走資本主义道路的政治主張，非常迎合資本家的胃口，特别是"軍队国家化"，非常迎合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惧怕共产党得势的心理。当时是蔣介石的天下，"軍队国家化"的結果，实际上要共产党繳械給国民党。最近他在国务院会議上說，他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就否定資产阶級，他的骨头燒了灰也找不出反党的东西，真是睁了眼撒謊。他的上述的主張，都是白紙上写了黑字

的。

他的轉向共产党，最后终于由香港到沈陽，是由于蔣介石封閉了各民主党派。这說明他是被迫向左轉的。到了沈陽，他大买古董。当时古董的价錢一落千丈，朋友們問他为什么买这許多古董？他說："看看政治行情，打打經济算盤"。这就充分說明他在解放区的政治态度的投机性了。后来民建总会在北京复会，他和黄任老、施复亮三个人为召集人，他总是和他們兩个人鬧意見，鬧不团結。不但如此，他还和許多人鬧意見，又說統战部在民建搞小圈子。他对民建会最不滿意的有兩种人，一种是共产党員，他說共产党員沒有执行党的政策。另一种就是接受党領导的非党人士，他說他們是为了个人名利。他仇恨他們比敌人还要入骨，实际上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反对党的領导。他慣于玩弄詞句騙人。譬如他把党和党員分开，他說他接受党的領导，但他反对党員。又如他說資产阶級与工人阶級沒有本質的区别。在他的文章里，这种論調很多。这就是他迷惑人的惡毒手法。

走資本主义道路是他一貫的志願

1955年春，民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他作工作报告时，講到一半，插进了他自己的話。他說中国民族資产阶級是紅色資产阶級，中国民主建国会，是紅色資产阶級政党。1956年冬，民建召开二中全会，他向中常会提出了几个原則性問題的意見，交大家討論。主要的內容是說民族資产阶級由于它的特性，所以沒有兩面性，他說民族資产阶級是一个革命的阶級，是向全世界資产阶級宣布起义的。他的这些荒謬言論，当时都曾經受到批評。大家帮助他糾正錯誤，但他沒有接受，而且把批評他的人怀恨在心。陈毅副总理曾批評他的"紅色資产阶級"的說法，他就記恨陈毅副总理；李維汉部長和許滌新副部長也都对他进行过批評，他对他們兩人也是記恨的。反之，如果是一个反动分子表示对他信任，他就会引为知己。例如，抗战时他在安徽做偽財政厅長时，偽省府主席調換了一个广西派的中等头目廖磊，对章乃器是比較言听計从的。因此，他將廖磊引为知己。在他的心目中，廖磊和李維汉部長相比，廖磊是知己，李部長是冤家。在政治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只認識个人的恩怨，他沒有真正的是非。

章乃器这次以帮助党整風为幌子，陰險地散布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已經有許多人駁斥过了，我不再重复。总的說来，他的反党是一貫的。就是在救国会时期，他就反党了。当时，在他的心目中，反动軍閥的地位远比共产党高得多。走資本主义道路，是他一貫的志願。發起民建会的政治主張，是他坚決走資本主义道路的自我招供。解放之后，資本家得到了改造，有了进步，但他原封未动。他罵資本家的进步言論是違心之論，罵馬列主义理論是教条主义。資本主义理論在他是"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他一开口用不着什么構思，就是成套的資本主义理論。

到处詆毀共产党，挑撥工商界与政府的关系

解放以来，只見他公开詆毀共产党，他劝大家"不要对党員有迷信"，說共产党員有李万銘，也有刘青山。他

說馬列主义理論不是共产党所能独断的。意思是他运用起来，比党員还要正确。他說他在粮食部有职有权，是他斗爭得来的。总而言之，他在工商界中尽力貶低党的威信，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在国务院会議上說，他要护党中央的威信，像爱护自己眼珠一样，也是睜了眼說謊）。另一方面，他又迎合工商業者消極的一面，迎合他們对改造的抵触情緒，大量散布民族資产阶級沒有兩面性，是革命的紅色資产阶級，定息不是剝削，資本家进入社会主义比喊口号貼标語的人要光荣得多等等謬論，来討好工商界。他还用非常恶劣的手段挑撥工商界与政府的关系，企圖煽动工商界脫离甚至反抗党的領导，变成他的群众，变成他走資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資本。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从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之后，从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对合营后資本家的技术專長和經营經驗評价为民族遺产，国家財富之后，他以为共产党在承認錯誤了，国际局势將影响中共的政策了，他的一直潛伏着的要走資本主义道路的企圖成熟了。所以从那时以后，也就是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在民建二中全会前夜，他的反动言論就大量出籠。他用"思想問題不能用決議来解决"的說法，箝制大家对反动言論的批評，而他却大量散布反动言論，引起了全国各地工商界很大的混乱。很多人不願意再上政治課，說政治課都是教条主义，除非章乃器去上課，認为只有章乃器是代表工商界的利益。邪气上升，正气下降，凡是講正面話的人都受到打击。一切最無理，最猖狂的話都上了牆报。工商界中出現了一些小章乃器，他給他們撑腰。这些人气焰万丈，而章乃器却說这是党整風的結果。他說这是

过去用压服，現在要用說服了，說服是要用高深的理論的。言下之意，你們不懂理論，你們就沒有办法对付这批人，你們就慌張了，只有他对工商界有四十年的研究，他最懂得工商界心理，又懂得理論，只有他有办法，这就是他預期的效果。事实証明，章乃器一貫是反党的，他走資本主义道路的願望沒有熄灭过。只要有机会，他的这一願望就会变成反动行动。这种反动行动很早就已开始，現在不过是更集中地表現出来，因为他錯認为現在时机成熟了。

坚持反动立場狂妄达于極点

現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已經公布，他歪曲毛主席的話的卑鄙伎俩，已全部大白于天下。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他的反动言論进行了严厉的批駁，全国人民已广泛地掀起了反右派分子的斗爭。但是他沒有做檢討，只听見他說："要他做檢討，他只有反批評"；他說周总理对他的批駁是断章取义，李維汉部長是偏听偏信。他的狂妄，他的坚持反动立場的頑强性，到达了極点。如果还有人以为这不过是理論上的錯誤，还为他的才华惋惜，这除了說明立場有問題以外，还能說明什么呢？

我覺得我們工商界和知識分子，必須投身反右派的斗爭，而且要从反右派的斗爭中檢查自己。我們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与右派分子的思想感情，或多或少有点共同之处，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倒並沒有那么热切的情感。我們常常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現出动搖不定。我对章乃器

的許多反动言論，一开始只把他看成嘩众取寵，把他当做为了个人滿足領袖欲而不擇手段，沒有从政治上去認識他的反动性与危害性。經过不断的揭發与斗爭，才逐漸对他的反动本質明确起来。为什么我們沒有党的領导，在政治上会这样的麻痹，这說明我們的思想还沒有改造好，我們的立場不是社会主义的立場，因此对危害社会主义的言論，就不可能有敏感性。因此，我必須在反右派斗爭中批判自己的右傾思想，鍛煉自己，使自己的思想感情能逐漸轉到社会主义这边来，使自己能够像工人群众那样的对政治上的是非，直覚地就辨别出来。在反右派斗爭中，隐瞞起自己的眞思想、眞感情，口里尽管喊得震天价响，但是脚底下是虛的，战斗力是不可能强的，这对于自己沒有好处。我們自己必須在反右派的斗爭中进行一次思想消毒。

再不老实交代就將自絕于人民

对于右派分子来說，周总理已經講过："經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驗和自己的覚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門对他們是开着的"。我完全同意周总理的說法。因为我們国家的社会主义的一致性，愈来愈巩固，也不怕右派分子造反。我們的党和政府还是从治病救人出發，希望他們及早回头。我們对右派分子的斗爭，实际上就是帮助他們及早回头。一切右派分子如果在这时还想狡賴、詭辯、要手段，不老老实实地徹底交代，那末只有自絕于人民。

（原載7月9日新聞日报）

章乃器勾結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进行陰謀活动

王 新 元

右派头子章乃器在人民代表大会所作"我的檢討"中說：

"依靠我那不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的个人英雄主义，我才能脫离泥坑"。

"八年来我的言論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确是毫無共同之处"。

究竟实际情况如何呢？为了徹底清算他，除了許多同志已經揭露他的丑惡言行以外，最近就他勾結特务、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具体事实作了一些初步調查和整理，揭露出来，使全国人民更清楚的看透他的本質。

章乃器是由浙江財閥与軍閥所豢养出来的一个政治野心家。一方面他鑽进救国会、民建会想搞点政治資本，一方面又一貫的与軍閥（李宗仁、陈誠）和特务（中統、軍統）有着千絲万縷的关系。在暗地里不断地进行一些不可告人的陰謀活动。例如：

1.在上海时代，一方面他參加了救国会，發揮了他的力量，应当承認有他一定的貢献，但是可惜的他一开始就不是全心全意的和全国人民一道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而是三心二意的玩弄兩面手法。他同时和国民党反动头子潘公展相勾搭，与桂系軍閥李宗仁密电往来，和托派王公度搞政治投机，为宋子文办"救国公債劝募委員会"；在救国会內則設法打击排斥靠攏党拥护党的沈衡老、鄒韜奋、錢俊瑞諸同志，企圖使救国会成为他个人的政治資本，擺脫党的領导。在蒋介石鎮压救亡运动时，他被"錯誦"了！在苏州的时候，他就轉托陈誠的亲信赵志堯向陈誠求救，吹嘘他是"理財專家"，可以替蒋介石"貢献微末"。果然出獄以后，他就叛卖了救国会，在申报發表"少号召，多建議"的文章，公开拥蒋，反对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領导。在一段时期，他的政治态度是依靠桂系，由反蒋到拥蒋，而貫徹始終的是反对共产党。

2.在武汉时代，他开始想投向陈誠的怀抱，走蒋介石的路，为陈誠献策，搞三青团，陈誠要他担任三青团中央幹事会幹事，而他自己要求作总幹事，可能陈誠对他这样一个兩面派的人物，还不敢十分相信，沒有如願以償。如是他又回轉来再找桂系軍閥李宗仁，当时在武汉的沈衡老等救国会的同志們，还想挽救他，力劝他"不要做官"，仍以繼續發动群众扩大救亡运动为得策。他不听，想以"团結抗日"为幌子，到安徽做厅長去了。

3.在安徽时代，章乃器当上了省府委員兼財政厅長，成为李宗仁的一等紅人。企圖大展其"理財專家"的身手。他在安徽的一年多的时間，幹了些什么呢？

（一）在財政方面他採用加捐加稅，發行銀行本票，組織五个稽征的武装队伍，搭上了財閥孔祥熙的門路，积極的支持了桂系軍閥的統治，而桂系軍閥的基本任务是"消極抗日，积極反共"，为皖南事变作好准备工作，可以說章乃器对此基本任务确是有所貢献的。

（二）他是"团結抗日"呢？还是"积極反共"呢？表面上他打着"团結抗日"的幌子，企圖以他个人为中心，依靠桂系軍閥作基础，控制进步力量，和CC派搞摩擦，以巩固和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当时皖南皖北都有新四軍，情況十分艰苦，进步分子大都集中在动員委員会这一組織里面，章乃器財权在握，从来沒有予以支持，任其自生自灭，而最坏的是他收集了民間槍枝，組織武装稽征队伍，一方面限制了新四軍的發展，同时又將这一队伍的領导权（主要骨幹）委派桂系軍閥系統与党对立的分子来把持，因此他走以后这支队伍就变成了"反共"的先鋒，他这样"釜底抽薪"办法，能不能說他是"积極反共"呢？这样的做法能不能說他是在"团結抗日"呢？

（三）在他个人方面，他和一个"众所周知"的女特务王立文姘居，王立文是三青团中央幹事会妇女处副处長，借着兒童保育院的地位进行搜集情报的特务活动，后来又同另外一个女特务方励同居，（方励也是反动头子方

治的密友）鬧得烏烟瘴气，他一貫的把“玩弄女性”的可耻勾当，和政治活动混淆起来，以致身敗名裂，不能不一走了之。

詐敲了陈光甫五万美金

4.在重庆时代，由安徽回到重庆，他並沒有忘情于陈誠、蔣介石、孔祥熙之流，等了年多，沒有“召見”，如是不能不“自仕而商”，搞起上川公司来了。在这期間，他又搭上了特务头子戴笠的关系，因为他有一个表兄叶燕蓀是戴笠的門生（一說叶是章介紹給戴的，要他交代）任督察处的特务，他曾經糾集与利用叶燕蓀的槍桿，敲詐陈光甫五万美金。另外还有一条黑綫就是通过他的特务外甥季灝的关系，繼續和潘公展来往，以取得与提供各种資料。在这段时期是他在政治上仍然想走孔宋的門路。救国会諸同志認为他屡劝不改，愈弄愈糟，于是开除了他的救国会的会籍，而他呢是在静观变化，待机而动。直到抗日战爭胜利，旧政协时代，他又鑽进民建会，想借工商界的群众基础来搞点政治資本，以滿足他的政治野心的要求。

和几方面特务保持关系

5.在上海、香港时代。抗日战爭剛剛胜利，蔣介石發动內战，章乃器的政治态度可以說和章伯鈞一样是“三分反蔣七分反共”，想搞第三种势力，走中間路綫。隨后看了蔣介石的瘋狂鎮压，民盟被封，民建不能活动，于是索性逃往香港搞地产公司作买办去了！但是在这期間他仍然保持了几方面的特务关系，举其要者：

（一）軍統特务廖公劭和他常有来往。

（二）他和閻錫山妹夫特务梁延武，共同支持孙米华搞伪国大代表，作为他的“代理人”。

（三）勾結香港的“楊小姐”——託詞作“珠宝生意”幹着黑暗勾当。

（四）另外还和叛徒彭寿、特务楊之清时有来往。

章乃器是一貫反党的，可見他說的“在資本主义社会追求社会主义，一貫拥护共产党，爱护党象爱护眼珠一样”，完全是假的。

直到1948年解放軍节节胜利，蔣介石的大势已去，中間势力形成不起来，第三条路綫早巳破产了！章乃器在朋友們的帮助之下才不能不勉强北来！看看新的政治行情的算盤如何打法。

以上这些事实，是根据各方面檢举的材料而整理的，可見章乃器在解放以前並不是什么不“同流合污”，並不是受到反动派的威胁，而是恰恰相反，經常与特务反革命“糾纏”在一起。他是一貫勾結黑暗势力反党的。他的这笔老爛賬如果他不繼續反动原來是可以不算的。但是这几年来他接受中共对他最大的信任，却抗拒改造，而且更加狂妄了！因此，我們要他在人民面前作徹底的坦白交代。

解放后引入特务佈置据点

解放以后，他来到北京是不是他“洗手不干”呢，不是，他仍然一貫包庇、引入和重用特务、反革命分子，处心积虑的布置据点，进行陰謀活动。茲就民建会內部分材料，加以揭發：

（1）丁国楨是章乃器在安徽时的"部下"，曾任三青团分队長，国民党区分部候补委員，力行队队長，1943年加入青年党。在1950年章乃器介紹他参加民建总会幹部学習会，結業后章乃器派他主办"民訊"，並承办章批的重要稿件，随后又保送他入华北革大学習，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准备重用，在鎮反时檢查出来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管制二年。

（2）陈咸池，1950年由章乃器函請港九分会保送他入民建总会幹部学習会，在学習中他与丁国楨、陈紹恩、阮如海（1955年肅反时查明也是特务）等串通一气，支持章乃器的荒謬主張（如何搞好我們的会），因此章乃器大为賞識。結業后，章乃器主張留会工作，經会內同志坚决反对，不得已乃介紹入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鎮反时查明他是中統特务，现在仍在劳改。

（3）陈紹恩，1950年章乃器介紹他入民建幹部学習会，1951年由章乃器介紹他到西安市分会工作，三反时查明他貪污抗美援朝捐款700（万）元；又据新疆檢举，他曾任伪迪化警察分局長，有非刑逼死革命幹部的血債，因而被捕。

（4）童国忠，1950年童国忠冒充会員函請总会救济他在長沙办的国泰机器車木厂，章乃器批示"可函厉無咎代为介紹武汉及西北紗厂生意"，並函請向德、彭一湖同志向湖南省銀行担保借款1,000元。随后童国忠又来信給"章委員乃器亲启"，信中造謠說長沙工商業"倒閉的七八千家""各工会唆使工人走偏向，向資方發生严重斗爭"等明目張胆的反动言論，章乃器批复"請国楨兄拟复予以教育"（注意他要丁国楨拟复）。鎮反时發現童国忠是一个罪惡多端的特务已被鎮压，所借款項由向德同志賠出，使向德同志在政治上受到損失。

以上四案是会內同志都知道的。章乃器在案發以后，从未檢討，好象与己無关似的。也从未向組織上坦白交代。

在民建搞反动小集团

其次，在民建会內他拉攏一批历史复杂、思想反动、行为鬼祟的右派分子如林滌非、許汉三、丁裕長等作为他的小集团，把持宣傳教育处，进行宗派活动，企圖打击排斥党員和进步分子，篡夺会內的領导权。这一方面已經有人揭發，茲不多述，但是应該連系他一貫勾結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案件来檢查他的陰謀的各方面，才能認識他的反动本質的全貌。在工商界方面，除了他到北京、天津、上海、杭州、保定，公开"点火"，煽动工商界抗拒改造以外，他是否另有若干暗綫呢？各地揭發出来的右派分子，是否已經形成或者正在形成他的一个反动集团呢？这就依靠各地工商業者坚决和右派分子斗爭到底，予以無情的揭發，一齐打垮！

章乃器与章、罗联盟的关系

最后还要揭發他与章、罗联盟的关系，举二个事实：

（1）許汉三坦白在去年章从北戴河返京后特約許汉三到他家密談。章說：中国的民主太少，教条太多，应該搞兩院制，並且惡毒的造謠說"周总理曾提到政协可以改

成上議院”，許汉三秉承意旨，就在宣教处內宣傳“兩院制”的好处。我們知道章伯鈞的兩院制也是那时提出的，可見在北戴河章、罗、章等曾經密議过他們的反动主張。

（2）章乃器公开承認了王造时曾經和他們商量救国会的事，同时顧执中也和章談过救国会的事，可見談的不只一次不只一人。問題不在救国会的名称，而在另組資产阶級的反动政党。依照章乃器的一貫言行，他是不会反对另組“純粹的”資产阶級政党的。这种“主張”虽然夭折了，但决不能否定章有些陰謀，章、罗、章的联盟不会是紙写笔載，賭咒發誓的，他們的思想一致、立場一致，而且一再在黑暗浮动，应該肯定他們是串通一气的。章乃器說他沒有在学生中点火。其实他經过他的狗头軍师許汉三的兒子許南亭，在北大大放毒气，並且把沒有公佈的赫魯曉夫同志的报告，告訴許汉三和許南亭，在北大进行煽动。但是分配給他的主要任务是在工商界点火，难道他能抵賴嗎？

至于他在光明日报社务会上公开支持章伯鈞、儲安平也是無法抵賴的事实。

章乃器所以敢于頑抗到底，一方面固然由于他“至死方休”，一方面他还迷信他有“市場”这个堡壘，必須更加广泛地动員工商界，徹底揭發他的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罪行，使他在鉄的事实面前不能不認罪。

我們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章乃器——資产阶級政治野心家

吳 大 琨

大家都知道：章乃器是以在抗日战爭前参加“救国运动”（当时，实际上称“救亡运动”）成为“七君子”之一而起家的。可是“救国会”时代的章乃器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如果我們今天来檢查一下，他到底能否称作“君子”，实在是很成問題的。

現在我先来提供一些材料。

大家知道：抗日战爭前的“救国运动”是由1935年的“一二·九”北京的学生运动所首先發动的。1936年的春天，上海的人民，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就先后成立了“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职業界救国会”等組織，其他各地，当时也都有“救国会”的組織先后成立。在1936年的5月中，上海就又成立了全国性的各界救国联合会，当时参加这个会的領导人物有：宋庆齡同志，何香凝同志，馬相伯老先生，沈鈞儒同志，鄒韜奋同志，李公朴同志，沙千里同志，史良同志以及章乃器与王造时等人（当时在南京的領导人还有孙曉村、千家駒、曹孟君等同志）。当时章乃器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內所担任的职务是宣傳部部長。我是宣傳部的总幹事，負責主編“救国会”的机关刊“救亡情报”。（在我之前，主編“救亡情

报"的，是刘群同志，他是中共党員，已經在"八·一三"抗战爆發后，在苏州病故了。）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我当时就住在章乃器家里，所以以私人关系而論，我可以說是与章乃器有較深的关系的。

很早就同反动派勾搭，为个人制造"政治資本"

章乃器在"救国会"时代，是不是曾經很热心于抗日救国的工作呢？我認为应該肯定說是的。他为了坚决主張抗日，在当时也确实曾受到过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他本来是浙江实業銀行的副行長兼中国征信所的董事長。我住在他家里的时候，他就已經被国民党反动派停止了他的这些职务，可是他仍繼續主張抗日，这是他作为一个民族資产阶級代表人物在抗日这一点上所表現出来的好的一面。但是正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資产阶級的代表人物，所以即使当他在从事抗日救国的工作的时候，他也还是有他的許多表現他个人政治野心的活动的。

就我所知，他在1936年11月被捕入獄前，他就有过这些活动：（一）他与当时的宋子文有秘密联系，据說曾接受过金錢方面的餽贈。（二）他与当时的一些地方軍閥也有秘密联系，特别是与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有秘密联系。

由此可見章乃器虽然当时是在一边提倡抗日救国，可是一边也就在为他个人制造"政治資本"，想与当时的統治阶級取得妥协的。尤其重要的，就是章乃器在一开始，他就有他的那一套資产阶級的对各种政治問題的看法的。他的这一套看法，当然不可能与当时的地下党員的看法相一

致。所以当章乃器在被捕入獄前，在上海領导抗日救国运动时他是可以說就与当时的一些地下党的同志們在政治見解上（例如，当时在上海的錢俊瑞同志）經常發生矛盾的。

决心投靠反动政府，硬要别人替他吹嘘

他入獄以后，他的态度就更坏了。当时，他們"七君子"（实际上，应該說是"九君子"，因为还有孙曉村与曹孟君兩同志，当时是被关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內的。）关在苏州。我曾好几次冒了險，冒充他們的家属，去到监獄內探望过他們。在我的印象中，沈衡老与鄒韜奋同志每見到我时，总是很关心外面的工作及工作人員的生活等等，斗爭的精神可以說是很旺盛的。章乃器就不同。有一次，他就曾經請托过我要用笔名去为他写一些文章發表出去，称道他的才（据他自己說，他对改进票据交換等技术方面是有貢献的），目的是要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重视他这"人才"。我当时就覚得他的要求很不对头，所以我也並沒有按照他的希望去写什么文章。

但他在獄中，既有这种表示，可見他是在出獄前就已經决心向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降的。

后来，"八·一三"淞滬抗战爆發，"七君子"出獄后，其他的"君子"都坚持着原来的立場，积極为人民的救国事業而奋斗，只有章乃器与王造时兩人是很明显地改变了方向的。

章乃器一出獄，首先就停刊了"救亡情报"，所有的干部，他也就都不要了。因为这时候，他已經覚得有了足

够的“政治資本”，再搞这些眞正的人民救国工作，就要影响到他的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降的行动了。

公开提出反动主張，当伪官，敲竹槓，撈鈔票

淞滬失陷后，章乃器就索性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降的主張来，那就是“少号召，多建議”的主張。所謂“少号召”，就是要我們少“号召”群众去向国民党作斗爭，所謂“多建議”，就是要我們大家都去向国民党作参謀。

这一投降的表示，政治上的影响是極坏的。所以当时毛主席曾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爭的形势和任务”这一篇文章中，狠狠地批評了章乃器这一投降举动（見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三五三頁）。

章乃器自淞滬失陷，經香港去汉口后，就也索性与国民党的一些反动头子們作进一步的勾結。当时，他与陈誠的关系是很不錯的（他倆是浙江青田小同乡），通过陈誠的关系，章曾經担任了伪“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干事的职务；陈誠也曾一度考虑要章担任当时伪国民軍事委員会总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長，以代替左派的郭沫若先生，后来不知怎样，未能成事实，他就又通过李宗仁、白崇禧的关系去安徽省担任了伪安徽省政府的秘書長兼財政厅長。

安徽財政厅長的职务垮台后，他就去了重庆，通过陈光甫的关系，与上海銀行系統下面的大業公司合組了一家企業公司——上川公司。据說，他在上川公司时代，曾經利用“囤积居奇”等投机活动，賺了不少錢，最后又設法向上海銀行用“敲竹杠”的方式，發了一笔不小的財。后

来，他又利用这些資本在香港搞地产投机活动等。他的許多財产，就都是这样地搞起来的。

与別人共同發起組織民建，他个人却有不可告人企圖

章乃器在出獄后政治上旣与“救国会”的其他同志走了不同的路綫，他当然也就早在实际上离开了“救国会”的队伍。在武汉时代，鄒韜奋同志就曾因他去安徽担任財政厅長一事主張过要开除章乃器的“救国会”会籍。

后来，章在重庆也始終与沈衡老搞不好。理由很明显，因为衡老是始終接近党的，在重庆时，王炳南同志就曾經在衡老家內，担任过衡老的秘書。章对这件事是很不滿意的，总在背后駡沈衡老，說衡老不覚悟，老要跟了共产党走。

章旣与“救国会”搞不好，于是就索性想把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組織起来，成立一个代表資产阶級的政党，这就是他在1945年为什么願与黃炎培同志等合作發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他个人的不可告人的企圖。虽然在当时，絕大多数發起人，包括黃炎培同志在內，已經有了接受共产党領导的意圖。

忘恩負义向党进攻，陽光之下原形畢露

前面曾經說过，章乃器是有他的一套資产阶級的“理論”的，他在民主建国会成立后，确曾用他的“理論”，欺騙过很多工商業者。

在章乃器的心目中，中国的工商業者，就都是他的“群众”。他是要利用了这些“群众”作为他的“政治資

本”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与人民給了章乃器以很大的荣誉与信任。可是章乃器却还是老一套，一点也沒有想到应当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好好地改造他自己。尤其荒謬的，就是他竟不注意到这几年来中国工商業者的进步，中国民主党派的特点，妄想把中国民主建国会这样一个始終在党的影响与領导之下的民主党派，变質成为什么“紅色資产阶級政党”。因此，他对于絕大多数要求进步的工商業者，非但不鼓励他們积極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反而还創造出种种荒謬理論来阻碍他們的改造。他的这些主張自1954年以来就遭受到了絕大多数民主建国会会員的駁斥，可是章乃器也还是不覚悟。自党开始整風后，他就更猖狂地鼓动工商界人士向党进攻，終于完全暴露出了他的反动的眞面目。現在章的所有反动言行，已經为大家所揭露。我也把他自“救国会”以来的一些情况，向全国人民作一番介紹，使大家充分認識章乃器的所以会变成为今天的右派野心分子的头子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一貫的历史背景与阶級根源的。

从章乃器的一生發展中，我們也可以得到这么一个教訓，那就是任何知識分子，如果他不能在今天好好地改造他自己，成为眞正的工农大众的知識分子的話，那么，他就一定会变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知識分子的。

章乃器的道路，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

（原載7月3日大公报）

鉄祥的事实駁斥了右派分子章乃器的詭辯

何尊梅

右派分子章乃器在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我的檢討”，不但絲毫沒有交代悔改誠意，而且还污蔑設派和自我标榜，把自己列为“左派”人物，企圖蒙蔽全国人民的視听。他玩弄这些無恥謊言，無非是他还妄想以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繼續伪裝进步来欺騙人民。我現在針对他胡扯自己“只是有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政治上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不同流合污的孤高的人”这些謊言，以具体事实，来进行揭露和駁斥。

一、卑躬屈膝，为蔣介石捧場

我們从他的历史根源追查，别人已經揭發他在国民党反动派里担任反动职务和对李宗仁、白崇禧勾結等事实不談，从他脫离伪职之后，繼續用尽心机向反动当局暗送秋波，企圖取得信任而东山再起的事实談起。他在1940年12月在重庆成立“中国工業經济研究所”自任所長，当时他一方面抓全国工業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国貨厂商

联合会等工业团体，拉拢民族资产阶级，表面上为民族资产阶級利益講話；同时通过举办各种研究經济問題的座談会，这种座談会不仅有工商界参加，而且邀請伪資源委員会、战时生产局、及伪財政金融等各部門的反动头子参加。章乃器把座談会变作为向国民党献媚、宣揚当时反动政策和妄想从中調和官僚資本与民族資本之間矛盾的工具。在一次"解决工商界当前困难問題"的座談会上，他大为国民党反动头子蔣介石捧場，他說"蔣委員長在第二次生产会議訓詞，其中一点，使吾人特別兴奋，其言：'战时經济建設与战后經济建設必須一气呵成，絕不可有战后重起爐灶思想'"，他还帮腔重复着說："故現有工業基础，不但必須保存，而且須使巩固發展"，那种奴顏婢膝的样子，很难以笔墨来形容。当时在一起工作的共产党員王寅生同志，在几次座談会后，向我說："章乃器在大家面前趾高气揚，对反动官僚，則唯唯諾諾，殷勤备至。"

二、为反动政府策划金本位制

1943年11月，在一次討論物价問題的座談会上，章乃器掏出了一个帮助反动派策划的搜刮人民錢財的錦囊妙計。他主張："目前內运之美金二万万元之黄金，最好能作为稳定幣制之用，而採取金本位制，其办法只須由政府'宣佈'每法幣十万元，可兌換重十兩之黄金，如是，人心即可安定。"他的"金本位制"献策的具体內容是什么呢？章乃器毫不掩飾厚顏無恥說："二万万美元之黄金，可以偿付全部發行額而有余，較之战前我国發行总額为十六万

万元，按当时滙价反需五万万美元，始能偿付者，其于'国庫'之利益，亦甚巨大，几可謂打了六年仗反賺进三万万美元。"他献了这惡毒的計策，还唯恐国民党反动派通过他的計策，穷兇極惡来搜刮人民有些不好意思，还帮助国民党反动派消除思想顧虑說："此並非政府应打此种算盤，但既于国計民生，兩有裨益，則人民固願政府能賺此巨款也"（原文載"工業問題叢刊"）。章乃器伪装經济学家，他的"金本位制"献策的实質是什么呢？实質是把中国貨幣的領导权，斷送給美国帝国主义手里，实質是代替蔣介石把通貨膨脹理論化，搜刮民脂民膏合法化。这在当时即使是資本主义貨幣学家也不肯出此，有良心的資本家都是痛恨的。而章乃器却奴顏婢膝向他主子献媚划策，难道这不是政治上反党反人民嗎？

三、卖身投靠，帮助反动派草拟方案

在抗战后期，章乃器企圖获得反动头子蔣介石的青睞，以便东山再起，在帮助他策划方面，还卖了不少气力。他以有利于民族工商業者为幌子，組織了一批反动官僚，分別草拟了"建造渝內輕便鉄道計划"、"修理長江区損毀輪船計划"、"农具制造計划"，他还亲自草拟"組織联合企業公司"的方案。这些計划，都是要求"官民"合办，他企圖以非官非民和亦官亦民的兩面身分，左右逢源，一方面籠絡和代表民族工商業者，一方面妄想国民党反动派有鑒于章乃器对他們的忠心耿耿而重用他，把这些事業，委託他来經办。当时反动派多少採納了这些計划，却並沒有重用他，章乃器卖身投靠虽落了空，但是，

他对反动政治，迫切追求，不惜向国民党反动派卖身投靠的铁的事实，难道还能蒙騙得了人嗎？

四、为了不跟共产党走，在民建宣言中反对用“人民”二字

在这段时間里，章乃器的政治路綫是什么呢？他是以民族工商業者的身分，走的是官僚資本主义的路綫是很清楚的，但是此路不通。接着他便抓住旧政协机会，發起組織以民族資产阶級为基础的民主建国会，成为一个代表資产阶級的政党，坚决走中間路綫。他的口号是反对国民党，但也不贊成共产党。在成立民建会草拟宣言时，他坚持反对原起草宣言中的“人民”二字，坚决要用国民党反动派經常所称的“平民”二字，他說：“人民”兩字是共产党慣用的名称，我們不跟共产党走。从这些具体細节問題上到重大問題上，他是一点都不含糊的。他一貫主張在国共兩党之外，組織一个龐大的第三种势力，以便随时对抗。这样，和他解放以来，到处散佈反党謬論連貫起来，对他今天反党反社会主义企圖資本主义复辟的陰謀，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五、对中国工業經济研究所轉向社会主义表示冷淡

在分析批判章乃器在解放前后反党反人民的言行的时侯，有人却說，章乃器对中国工業經济研究所总算对人民做了一个好事！那末，讓我們来分析一下中国工業經济研究所的發展。中国工業經济研究所在章乃器亲自掌握的一段时間里，它所进行的工作和出版的刊物，除被利用作为拉攏民族資产阶級和向国民党暗送秋波的工具，坚决走資本主义的道路外，絲毫找不到拥护社会主义或靠攏社会主义的气息的。1947年章乃器离开上海，跑到香港，对研究所工作，並無安排，一走了事。从这个时期开始，研究所渗进了大批进步力量，其工作和刊物，开始从靠攏社会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迈进。当时在地下环境中，做了一些暴露反动統治下的經济危机，向工業界傳佈新民主主义經济理論，及其在解放区实施的成績，並以調查研究准备解放时有助于接管时的参考資料。研究所后期这一点点对人民有利的好事，完全是在党的領导下获得的，是与章乃器毫不相关的。而章乃器对研究所后期是採取冷淡的态度，难道还不是他在可以利用作为自己政治資本时，是很感兴趣的，一到研究所工作，由資本主义路綫轉向靠攏党而他無法利用作为个人政治資本时，他就一点也不感兴趣了嗎？

六、企圖把中国电影事業投向美国九大影片公司怀抱

1946年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章乃器和一些文化工作者發起筹設崑崙影片公司，上川公司投資了一部份。但剛剛拍攝了三个片子以后，他認为文化艺术事業，投資人不好控制，人事組織安排也不尽如他的理想，而且賺錢也不一定靠得住，就中途退出了。当时崑崙影片公司拍攝的片子是进步的，反映和抨击反动統治黑暗面和反动統治压迫下的悲慘生活。这一进步的文化事業，緊望章乃器很深，希望他能够支持它，但章乃器毫不考虑地退出了。章乃器的企圖到底是什么呢？根据当时章拟拉股的一个股东的揭發，章乃器原来的企圖是第一步筹集美金十二万元，先拍

摄一、二部电影做招牌，再进一步争取美国九大影片公司（好莱塢影片公司等）前来投資，合成六十万美金，規模就大了，可以同英美資本比美。还指定这位股东担任制片厂厂長，章乃器自任董事長。可是这位股东不干，他看情况不能达到企圖，就此罢手了。这表明他还野心勃勃企圖引狼入室，把中国电影事業的幼苗，断送在美国帝国主义者手里。

七、伪裝工商界“知心”，到处散播毒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与人民給章乃器以很大的荣誉和信任，可是他却还是老一套，絲毫沒有考虑如何在党的領导下，好好地改造自己，还是牢固地保持着投机家的本色，無时無刻不在夢想把民建会变为一个不接受共产党領导的十足的資产阶級政党，以便能够随心所欲地操縱利用。他到处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謬論，千方百計地企圖实現反动的資本主义旧民主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保衛資本主义剝削制度的“万古長存”。部份工商業者对社会主义改造有对抗情緒，他便在各大城市到处号召和煽动，要工商業者“把低着的半个头抬起来”，“展开斗争”。在毛主席提出十大关系，还未向下傳达的时候，他到处乱講，他歪曲毛主席的講話說：“‘調动一切可以調动的力量’是和我多年来的一貫主張，完全相符合的，过去民建会对我的这些意見，引起爭执，現在証明我是正确的，某些同志教条主义証明失敗了。”

八、拉攏落后，打击排挤进步，陰謀篡夺領导权

章乃器在民建会和工商联系統中，拉攏上層，俘虜群众，打击排挤党員和非党骨干。拉攏工商界上層人物是他一貫的做法，他把資本主义比較集中的大城市为重点，更勾結这些大城市的工商界的領导人物。上海是他的主要市場和基础，他一到上海，这些人便請客集会座談。他千方百計的鑽工商業者消極一面空子，利用他們思想上的弱点，通过写文章，做报告，散播毒素。他还替民建会上海分会个别犯錯誤的負責人撑腰打气，鼓励他們和他一样对抗党的領导，为少数工商界犯錯誤受处分的人“伸宽”“平反”。他一向極力主張民建会应以代表資产阶級利益为主要任务，反对同一切工商業者不法行为作不調和的斗爭，他主張多鼓励，少批評，並提出民建会內非工商業者的知識分子和机关干部应为工商界服务。对北京和上海兩地会內的党員和非党骨干一貫仇視，进行打击排挤，在会內組織小集团，陰謀篡夺領导权。

綜观章乃器的历史根源和解放以来一貫的言行，从头到尾都不是站在贊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場，誠心誠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領导的，而是自始至終玩弄兩面派手法，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解放以前是不惜向国民党反动派卑躬屈膝作政治投机。解放以后忘恩負义到处散布反动謬論破坏社会主义改造；現在又趁着共产党整風机会，他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混在眞正善意帮助共产党整風的人群之中，趁火打刦，混水摸魚，进行他的蓄意

已久的政治陰謀活动。現在，事情已經很明白，他們过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計了工农群众和知識分子的覚悟程度，过低估計民主党派中多数干部成員和工商界人士的政治覚悟程度，他們到处碰了壁，还想掙扎施展他一貫的狡賴伎倆，企圖蒙混过关。可是，国家已經巩固，人民的識別力已不断提高，現在摆在他們面前的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老老实实徹底向人民交代他們的反动活动並改变反动立場，求得人民的寬恕，如果繼續頑抗，势必自絕于人民。

章乃器的"和平土改"的陰謀

孟 秋 江

章乃器的"我的檢討"，不是檢討，而是給自己化裝，以兩面手法来掩盖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恶面貌。用兩面手法幹的丑事，想再用兩面手法来掩盖它那是困难的，因为我們已識破了他的手法，迷惑不了人了。

1951年夏季在四川想搞"和平土改"，这是章乃器早已承認的事实。所不同的，他只承認自己犯了和平土改的思想錯誤，不願意承認这就是他一貫反党的言論和行动的一部分；而我們和云門乡的农民是愈看愈清楚，这是章乃器極端隐蔽的反动活动，不能不来揭露了，讓大家認清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貫性。

他在檢討中說："我参加各項工作、各种会議，以至到各地去視察，一貫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覚，帮助領导解决問題，而絕不週事生非，到处点火。"現在，我們来看看他在土改中的整个活动，証明他是在騙人。

第一，他在土改中是週事生非，到处点火，几乎把四川合川县四区的土改搞成和平土改区。我們到四川去参加土改工作，四川农民把我們当作毛主席派去帮他們打垮吃人的地主阶級的亲人来接待的。可是我們当时的团長章乃器心怀叵测，一开始就想搞"和平分田"，走他的改良主

义的道路。因此，他在土改中强調严禁打人的政策，强調坚持合理合法的斗爭，要在群众革命的阶級斗爭中，不發生任何打人的事件。同时，他認为农民运动中發生吊打地主的事，都是下面幹部执行政策不力的結果，是上面好、下面糟所造成的。这次，他想由他来創造一个奇跡，来証明他的理論和經驗比共产党高明。因此，他在土改中貫徹的政策，就是严禁打人这一条。至于充分發动农民的根本政策，他是不願貫徹的。

章乃器自称有主人翁的自觉，但可惜的很，他不是一貫地帮助領导解决問題，而是給領导增加問題，是束縛群众手足，自觉地替地主解决問題，而且表現得非常坚持和尖銳。当时西南局邓小平同志对于严禁打人的問題特別对章乃器作了解釋，要他了解农民出于义憤而打人是正义的，农民为了追回土改果实而犯了吊打頑抗的地主的錯誤，只能加以劝說。章乃器却神气十足，不以为然。他很不滿地对我說，这是眼开眼閉地执行政策的办法。这意思是說：上面好、下面糟，中間这一層也不妙。当川东区党委主任魏思文同志来重庆給我們做川东区土改报告时，章乃器的为地主阶級設想的"主人翁的自觉"到了不可抑制的程度。把他"从党員那里学来的直率"（这是他檢討中的話）来对共产党員了。他在会上責問："吊打是造成僵局，还是打开僵局的办法？"会后他很得意地对我說："我很尖銳吧，問得他（指魏）想一想后只好回答'絕对禁止'。"在章乃器这种思想的压制下，幹部怕出打人事故，違反政策，但又怕群众發动不起来，因此区党委派去的赵增益同志被迫宣布："幹部打人，幹部負責；幹部暗示打人，幹部負責；群众打人，幹部負責。"当时的情况，根据西南局指示的分析是：（1）該区地主应賠罰数是八千担，而已賠罰数只二千余担，地主衣服穿得虽很坏，但並未低头，甚至認为"政策变了，政府对地主开明了，不要紧了"。他們表面上承認賠罰，实际上裝窮，頑抗不繳。（2）据說"幹部打人幹部負責，幹部暗示打人幹部負責，群众打人幹部負責"，已經变成运动中的法律。結果，群众的义憤也在被制止之列，这自然要長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風，不容易掀起群众革命的声势，使地主依理服法，不敢胡作乱为，不敢抵抗。这就是群众沒有充分發动，地主尙未徹底打垮的僵局。也就是說，出現了章乃器制造的"和平土改"的危机。

可是章乃器却認为地主阶級已經徹底打垮，並得意地認为这是成熟的經驗。自己拟發出第三号通报說："实际工作中証明，斗理斗法是使地主眞正低头完全被斗垮的最有力的武器"。他要通报川南、川西、川北各队，推广他的"和平土改"的"經驗"。表現章乃器的理論和經驗是了不起的。

第二，反抗西南局党的領导。西南局为了及时糾正这种"和平土改"的危机，曾發出指示，認为不符合党和政府放手發动群众、徹底打垮地主阶級威信的政策。章乃器对这个指示是不服气的。同时他早就注意西南局的动向。西南局在發指示前，曾派程子健、廖井丹兩同志来云門鎮調查，章乃器要我了解他們来的目的是什么，可見他有点心虛。他为了抵抗西南局指示，煽动团員並亲自下村訪問农民，收集材料，証明群众基本上已發动起来，地主基本上

已打垮。合川县土改委員会为了貫徹西南局指示，召开会議，我們全体出席；章乃器在会上反对地主主力沒有打垮，群众沒有充分發动的說法，並用个別人反映的“地主已打垮”，“地主不可怕”的話，来辯駁四区沒有“和平土改”的道向，意圖掩盖自己的陰謀。各乡各村匯报的情况同章乃器的估計完全相反。但他仍蛮横地强辯說：“經过了清匪、反霸、減租、退押等三个战役，还說地主尚未打垮，則人民政府何在？”同时，他更不同意在今天还說“革命不是綉花”，認为今天已不是1927年，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了，农民革命运动应該更成熟、更坚定、更細致，我們是有可能在一定范圍內来控制群众运动的。他的这一观点，在会上遭到了駁斥，因而不得不勉强同意“艰苦深入發动群众打垮地主阶級的决定”，並同意做完这次“加工”再走。但是他心里極为憤慨。晚上在我住房里，他对击潰地主主力一点和我爭吵。他把頑抗的大地主，比成逃到台灣的蔣帮。他說：“大地主的頑抗，是一个阶級被消灭时应有的掙扎，难道地主阶級中不应該有忠臣烈士嗎？”記得他当时的不愉快，快要达到拍桌大駡的程度了。我真不明白他气从何来，想是又犯了“不与当时环境同流合污的个人英雄主义”，找我这个秘書長出出气吧。現在可以看的很清楚了；章乃器的反动罪行，並不是什么思想問題，而是为地主阶級“仗义执言”，义憤塡膺地反抗西南局領导的政治問題。

第三，爭夺对土改的領导权。三大运动委員会所訂的参加土改工作团团員須知規定，全体团員到达地方后，即分散参加土改，受当地統一領导。章乃器是团長，但不遵

守这規定，强調与当地土改領导机关“共同負責”，想因此形成双重領导。因为他有此想法，不得不成立川东四区土改工作联絡委員会，以适应他的願望。他对川南在整个土改領导机構中，採取从上到下的混合編制，使許多团員能共同領导一个乡的土改，感到甚为滿意，因此，对川北队分散到各村参加土改的做法，表示不滿。在第二号通报中，他批評川北队过于分散，不能对团員进行結合工作檢查提高思想的領导，並認为这一点，就是“一切依靠地方”思想的錯誤。他对不能全面領导土改团也是不滿意的，他認为脫离了中間土改阶段即实际参加土改阶段的領导，便成为“斷身龙”，便会耍不成。章乃器不仅想在工作上爭夺共同負責的領导权，而且还想在理論上夺取領导权，他的野心很大。这一点，在和平土改的一切活动中，都可以找到根据和說明，不再重复。我願意用他自己的招供来說明这个問題。他在他自己写的土改总結当中說：“用对人民、对国家負責的态度，实行‘知無不言，言無不尽’是完全必要的。即使我們的意見与中共領导同志有矛盾，也应据理力爭。但在力爭無效之后，我們还应該用虛心的态度尊重中共党的理論与經驗，把自己的那些沒有經过实踐証明的理想收回去，把自己那些过了时的經驗放棄掉。”这段供詞，有極大的虛假性，須找事实来說明他的真相。所謂“据理力爭”，就是力爭土改的領导权，来实現他資产阶級的修正主义的“和平土改”的理想，破坏土改，使資本主义在农村里的根子不致于斬断，將来可以借屍还魂，为地主阶級留复辟的余地。所謂“尊重”，就是暫时退却。因为他沒有办法去实現他的“理想”，只好退却。所謂“收

回”和“放棄”，就是乘机再起。所謂“知無不言，言無不尽”，是他向党爭夺領导权的烟幕。他害怕过分伤害地主阶級的利益而想領导“和平土改”，就是在这个烟幕下搞的。但他很陰險，他怕自己失去支持他的群众，說：“中共的負責同志是一再要求我們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尽的，随声附和与盲从是他們所坚决反对的。”他是在这一烟幕下打人。当他看到团員中站在地主立場上的人逐漸少了，同农民站在一条战線上去打垮地主阶級的人多起来了，就誣蔑农民是有狹隘性的、报复主义的和保守性的阶級。他还提出，一个領导者必須站稳工人阶級立場，而不能站到农民阶級立場上去。他用这样的問題，在团內引起爭論，模糊思想。他說，小資产阶級沒有稳定的立場，多接触农民，就站到农民阶級的立場上去了。因此，他就抓住所謂“立場”問題，並以可能違反了工人阶級为領导的土改政策，做了群众的尾巴为威胁，企圖动搖一些人的思想，不要去支援农民和地主的斗爭。这是極大的挑撥。如此种种，章乃器还說自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眞是恬不知恥！

土地改革是一場激烈的阶級斗爭，是在共产党領导下进行的偉大的革命事業。政协全国委員会組織参加西南土改工作团去四川支援农民打垮地主阶級，並从中受到鍛煉和改造。人民把这样重大的責任交給章乃器，而他对国家和人民給他的荣誉，並不滿足，意圖篡夺領导权，站在地主阶級立場，同共产党对抗，搞“和平土改”，破坏偉大的土改运动。这是極端惡劣的反党活动，也是他一貫反党活动的表現。我們要他徹底交代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罪行，重新做人。

章乃器破坏土改的罪行

徐 崇 林

右派分子章乃器在人代会上的檢討，我不仅不同意，並且是十分憤慨的，他不老实，完全說的假話。他是人民日报社論所指出的屬于第三类的，即“也有一些人的‘檢討’，一望而知是沒有交代悔改的誠意的”。他說他經过深刻檢查，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沒有任何共同之点，他的錯誤的性質，是資产阶級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風。誰能同意他这种不符合事实的假話？他太不老实，他是徹头徹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骨幹分子，他是工商界右派分子的元帅。

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由来以久，是一貫的。我要揭發他在1951年到四川合川县云門乡参加土地改革，採取反动立場，搞“和平土改”，破坏土地改革运动的陰謀事实。

1951年中央土改工作团参加四川合川县云門乡的土改运动，章乃器是团長。但章乃器这个右派分子，却大唱“和平土改”的反动調子，对于地主賠罰，他公然反对，他也不贊成群众的阶級斗爭。他站在資产阶級的立場，强調依理依法，与地主說理，为地主撑腰。章乃器对于农民的义憤，極表不滿，使农民的义憤受了束縛，抬起手来，

也不敢打下去。这在客观上也影响了幹部的积極性，而地主却暗中高兴，后来地主反映：“好在章团長来了，否則我們就要吃亏。”

章乃器对于土改的这种主張和行为，完全沒有敌我界限。如地主賠罰，他認为沒有什么法律根据，因此，主張有就賠，沒有就算了，不要追，这样如何能打垮地主的經济基础？还有对人民法庭的看法，也是十分反动的。章認为人民法庭代表国家机关，对农民的义憤，要有工人阶級的鋼鉄般的冷靜，实际上是他为地主撑腰，不承認人民法庭是工人阶級專政的工具，而認为是地主与农民之間解决糾紛的机关。云門乡的农民在最近揭發了章乃器参加土地改革的反动立場。农民湯士忠等揭發章暗地給地主撑腰的多种陰謀活动。章在开地主会时，常把农民武裝队員派到远处站崗，偷偷地和地主談話。地主們也常悄悄去找章密談，因而使得地主們更加囂張。湯士忠說，有一次他去追地主黃緒然应交出的財产，地主說：“章团長說过有就交，沒有就算了，你們不敢怎样，章团長是为我們办事的。”地主王仲平还說：“章团長說你們分到的果实还不稳当。”湯說他那时覚悟不高，以为章是中央来的也还說不稳当，就把分到手的磨子水車还給了王仲平。

农民譚紹成說，土改时地主的兒子王作舟見他背着槍，就說：“你們对地主这么毒辣，章团長說不符合政策，你們槍杆恐怕背不稳当，說不定二天要掉过来。”

章在土改中处处袒护地主。陈伯均說，农民斗地主就象挖了章的心头肉一样，他处处拿政策来吓唬农民，打击农民的斗爭情緒。当时农民都背地罵章是地主的后台老板。

章对工商業者兼地主更加袒护。赵崇貴說，地主郑崇文很狡猾，农民用手指着同他斗爭說理，章就訓农民一頓，說是違反政策。农民們見章对地主处处包庇，就說有了章乃器，地主阶級打不垮。

由于章乃器"和平土改"的思想影响，当时土改中还訂出了："群众打地主，幹部負責，幹部打地主，幹部受处分"，使得地主气焰高漲，土改运动受了很大的影响，后經中共西南統战部程子健部長等前往了解，發現章搞"和平土改"，及时反映中共西南局，迅速糾正。后来云門乡进行补課，並明确幹部打人是錯誤的，农民打人，幹部要劝說，但地主的威風不打下去，农民不起来，土改是不能成功的，后来採取了一些措施，錯誤是糾正过来了，但却已走了弯路，使土改运动是受了很大損失，政治影响也很不好。当时由于中央土改工作团是在川东区，章是团長，云門乡的和平土改还影响了川东区其他各地。当程子健部長等指出和平土改的严重政治原則錯誤时，章还說他搞得还不錯。还有章到重庆时的第一次会議上，違反中央指示服从地方領导的原則，要西南土改委員送土改計划，企圖爭取領导权，經反对未实現。总之章乃器的若干意見和行动，是違反土改政策、破坏土改政策、損害社会主义利益的。

这就說明，右派分子章乃器，一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站的是資产阶級立場，实行"和平土改"，为地主撑腰。他沒有站在农民立場，徹底完成打倒封建制度的土改运动。

还有章乃器在土改后向重庆工商界作报告时，强調斗

爭，要工商界不要自卑，要抬起头来，这就是向党斗爭，向党进攻，起了很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对"五反"起了猖狂进攻的影响。这不是算章乃器的老賬，而是从这些事实来說明章乃器不仅徹头徹尾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他的反动立場是一貫的，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最近章乃器在"鳴""放"前后的一些反动言行，四川的工商界，曾中了他的毒素，有的主張合营企業要撤出公方代表；認为定息不是剝削，是奬金；民族資产阶級沒有兩面性，等等，重庆、成都的工商界政治学校，有少数学員，認为教师講課是敎条主义，要章乃器来講，这些事实，还能說章乃器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嗎？

章乃器是一貫違法乱紀的不法資本家

资 耀 华

章乃器在最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假檢討，不能不引起全国人民一致的憤恨。假檢討中說什么“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針、政策，是沒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沒有怀疑，而且往往覚得是出于意外的好。”这完全是欺騙人民的假話。現在只要举出章乃器几件違法乱紀的罪行，看看他到底对于党所提出的方針政策，是怎样来对待的。是怀疑还是信任，是背叛还是服从。請看下面的事实：

章乃器在抗日战爭將要胜利的时候，在四川重庆使用其在国民党反动大头子戴笠手下做軍統特务的表弟叶燕蓀，糾集許多凶狠特务，包围威胁上海銀行所投資的上川实業公司董事会，敲詐了五万美金儲蓄券，在香港再开設上川企業公司，大做其股票、地产投机倒把的生意，当时曾借給吳羹梅同志所主持的中国标准鉛笔厂港幣一万元。解放后1950年初吳羹梅同志假借中国鉛笔厂發展生产为理由，向中国人民銀行騙取了一笔貸款，来归还吳所借的私債及吳自己垫款，並归还章乃器一万元港幣的借款，章乃器很清楚知道这笔貸款是騙来的，他身为中国人民銀行的顧問，不但不加以阻止，他反而就用这笔錢在北京囤积古董。

上面所举的几件事，看起来好象很簡單，其实既違反了人民政府的金融管理法令，又違反了人民政府的外匯管理法令，不但是怀疑党的方針政策，而是背叛了党的方針政策，实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

第一、假借發展生产为名，向人民銀行騙取貸款还私債，这是一件違法行为。1950年政务院所批准的貨幣管理实施办法第四章第三十一条明白規定：一切貸款只限于發展生产，並以專款專用为原則。因为借款帮助發展生产，是有利于国計民生的，是党的方針政策。但蒙混政府，騙取貸款还私債，是有害于国計民生的，这絕不是党的方針政策。因为發展生产，目的是繁荣經济，增加物資，活潑金融，巩固人民幣的信用，当然对人民全体是有利的；至于用来归还私債，则不但不能增加物資，反而助長消費，容易扰乱金融物价市場，損害人民幣的信用。1950年初人民政府实行的財經管理办法，也就是針对着这样投机倒把兴風作浪市場作斗爭。而章乃器却利用吳羹梅同志欺騙人民銀行騙取的貸款来偿还他私人債务，就要在当时投机市場上起推波助瀾的坏作用，正是对党的方針政策来一个反斗爭，这不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是什么呢？

第二、1949年4月7日华北人民政府外匯管理暫行办法第十四条，及6月9日华东人民政府外匯管理暫行办法第十二条明白規定：“除中国銀行及其指定銀行外，任何人不得自行經营代理买卖外匯，保存、或私相轉讓，違者得沒收其外匯並科以罰金。”我們国家为什么要管理外匯呢？因为国家蓄积了外匯，一方面預备用以輸入国家在發展生产所必需的物資器材，来促进社会主义工業化。一方

而防止外匯逃走，来巩固国家幣值。很明显，無論何人不得私自經营外匯，不得私自代理买卖外匯，更不得私自互相轉讓外匯。这当然是党的方針政策。所以一切公私团体个人的外匯交易，都要通过外匯管理机構即中国銀行，否則無論怎样搞法都是黑市逃匯。

关于逃匯这件事，1956年民建中央二中全会时已經有許多同志对章乃器揭發並提出严正批判，但章乃器在1956年10月27日民建中常会第二十六次大会上，强詞夺理的对自己的違法行为加以抵賴。他說：

"关于外匯問題，我想作些說明，这也是对国家的政策法令解釋的問題，过去民建工商联对工商界解釋法令，有左的傾向，有許多解釋的清規戒律很难守，人家說大法易守，小法难守，大法是国家的法律，小法就是清規戒律。外匯包括外幣匯票海外存款等，私人轉賬不在外匯之列。我們应該認識，我們的法令是合情合理的，解釋法令，应該实事求是。我与吳羹梅轉賬的动机不是抽資逃匯，也不是使国內資金外逃，如果我不同意吳羹梅这个还債办法，我們間的債务就不能清理，就会使他揹包袱，反过来說，如吳羹梅向黑市去搞，那倒是違法了。"

民建中央为了明白是非，曾向外匯管理机关負責同志請求解釋，1957年4月23日，得了外匯管理当局的正式答复是："在外匯管理办法公布后，国內企業正当需用外匯，应按照手續向外匯管理机关申請購买，国內人民在国外有投資或其他外匯資金需要匯入，应經过正当匯款途徑匯入，若有人私自互相轉讓，是違反外匯管理法令的。"

試問吳羹梅与章乃器之間的私相授受外匯，既未向外

匯管理机关申請許可，又未將外匯存入外匯管理机关，完全是私相轉讓。要不是吳羹梅同志在五反坦白交代，还是"神不知鬼不覚"的秘密。我們要質問章乃器，不經过公开的正式国家外匯交易所（当时是中国銀行主持的），这不是搞黑市是什么呢？不是違反外匯管理法令又是什么？

章乃器身为民主人士，身为国家高級幹部，身为民建及全联的負責人之一，仅仅为了私人利益，不惜知法犯法，不惜破坏国家金融，破坏国家幣制，不惜危害人民利益，危害人民民主專政，章乃器的这种行动，已經不是对党的方針政策怀疑不怀疑的問題，而是背叛了党的方針政策，这还不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嗎？

章乃器在他的假檢討中，还大言不慚、毫無心肝地說："我絕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死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他以为說了这样言不由衷的話，就可以欺騙人民，欺騙政府，欺騙組織嗎？这是絕对欺騙不了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八年来人民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章乃器走的完全是資本主义的道路。章乃器从香港回国后，無論党怎样照顧他，帮助他，但是他不相信党，不相信人民政府，所以他一到北京即大事囤积古董。他的上川企業公司，更偸偸摸摸做黑市投机买卖。表面到处喊拥护社会主义，暗里拚命搞資本主义。他为什么要囤积古董呢？就是不相信我們的人民幣。为什么不相信人民幣呢？就是不相信人民政府，不相信社会主义。当时人家問他为什么买这么多的古董，他到說了一句真話"看看政治行情，打打經济算盘"。从他这兩句話，看得很清楚，他以为人民政府的行

情不一定站得住，人民幣迟早要垮台的。万一人民幣成了廢紙，他的財产和古董还是完整值錢的；万一人民垮台了，他的前途还是很好的。

我們警告章乃器，生活历史是人人自己写的，庄严法律，是不容人任意解釋的。自己所写的历史，别人既不能增加，也不能替他減少；法律的解釋，只有一个，既不能左，也不能右。所以在法律面前，在事实面前，决不是章乃器所謂“众口鑠金”，“曾参杀人”，而是事实無情，鉄証如山。章乃器任何狡辯，任何謊言，都是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的。

从經济上看右派分子章乃器的丑惡面貌

吴 羹 梅

章乃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家。他的手法特别陰蔽。我們工商界理論水平一般比較低，容易吃下他不断贩卖的糖衣毒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是一貫的。解放后，他站在極端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立場上原封未动，由于我們工商界都存在着兩面性中消極的一面，因此發生阶級共鳴，在不同程度上容易上他的当。他的“七君子”之一的皮已經被剝开了，我在此文中来剝开他这个“爱国企業家”的皮看一看。他自从党号召鳴放以来，大放其“千方百計發揮工商界的积極性”的帮倒忙的謬論，現在来看看他所謂的“积極性”吧。

我是在抗战时期在重庆才同他比較熟悉的，現在就自己的回忆以及自各方面調查了解所得，来揭露他自重庆办上川企業公司起到解放后在經营工商業方面的丑惡行为。

（一）解放前从敲詐起家一直到为三大敌人服务

（1）敲詐起家。他自安徽卸任伪財政厅長到重庆以后，先在上海銀行投資的上川实業公司任总經理，不久便

和上海銀行头子陈光甫鬧翻了。他勾結当时反动政府的特务、他的表弟叶燕蓀，把上川公司的賬簿搶到手中，抓住其中触犯当时“經济法令”的弱点，包圍了陈光甫敲竹槓，講价还价，結果拿到一笔他所謂的下台的“退股和酬劳”五万美金，作了另办的、仍由他担任总經理的上川企業公司的他自己的資本，另外还迫使上海銀行所投資的大業公司向上川企業公司投資伪法幣一百万元，又向重庆工商界募集了些零星股款，掛起上川企業公司的招牌，混入了当时的重庆工商界。

（2）把賭注押在美帝蔣介石集团的胜利上。　当抗战时期一般工商界在交通困难、敌机轟炸、原料缺乏、貨源減少的困难时节，他並未經营正当的工商業，而是把主要資金买了美金公債和美金儲蓄券。一方面是把賭注押在美帝蔣介石集团的胜利上，像官僚資本一样，想大發洋財；另一方面这些美金公債、美金儲蓄券全可以放在自己口袋里，他也完全可以随时結束上川公司；对于正当工商業他是不幹的。

（3）当买办、做單帮。　抗战胜利以后，上川公司移設上海，他做的是些什么生意呢？做进出口生意，想和美国的工厂洋行打交道，做他們在中国的代理人。做棉花、粮食的單帮販运生意。当时这兩种商品投机性很大，他想在人民的衣食必需品中捞一笔大油水。他也曾投資“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以此标榜进步，实际也是用拆帳方式，並非直接投資于崑崙影片公司，並且他的“远大理想”，是想从此入手，將来与美帝的影片公司合作，做一个大买办。不經营民族工商業，始終是他万变不离其

宗的老主意。

（4）为三大敌人服务。　解放前章乃器离渝赴港，带去大批資金，在香港开办了港九地产公司，建筑高級公寓房屋；还代客买卖房地产。採用的方法是和建筑工程公司訂好合同后，就立刻向銀行做押款；招攬客戶；分宅出售公寓房屋，收取定金。一方面他企圖以少量資本謀取最大限度的利潤，一方面他看到解放战爭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取得胜利，他老早就为三大敌人在香港准备了逃亡时的安乐窩，忠实地为它們服务。

（二）解放后的种种严重違法行为

解放后絕大多数的民族工商業者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偉大的“五反”运动更是給了大家極其深刻的教育，可是章乃器不仅在“五反”运动以前，甚至在“五反”运动以后依然进行种种違法活动，現在只举其犖犖大者，揭發如下。

（1）一到解放区，就开始投机倒把。　章乃器于1948年冬到解放区，1949年就担任人民銀行顧問，可是他自己的錢，竟不存放在人民銀行，而是存在北京私营的恒兴錢庄，並且是暗存的不走帳的存款。

（2）上川公司在解放后是个“黑戶”。　章乃器为了抗拒党和政府对私营企業的改造政策，採取了隐匿不报的办法。解放后，上川公司仍在上海繼續营業，不能不在国际貿易業同業公会登記，也曾到上海市工商局登記，可是当工商局以上川公司登記手續不完备而命补办手續后，章乃器就从此不理会这件事了。到了1952年就在上海私自

把招牌摘下，完全隐蔽起来，利用上川公司是个未登記的黑戶，逃避了工商管制，偸漏稅款。出卖存貨时，以坐商冒充行商納稅，1949年盈余旧人民幣二百六十八万余元也未繳納所得稅。章乃器在最近給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会写信还睁着眼睛說謊話，說上川公司已报了停業，如果停業，他应当交出政府批准停業的証件。章乃器採取了不登記的办法，就是企圖一逃百逃，違法到底。

（3）勾結特务，隐匿敌产。　章乃器是勾結特务的老手，已另有揭發，現在我只就上川公司股东中举三个特务，作为說明。一个特务是彭寿，据章乃器自己的說法："彭寿是一个被我利用而且最后爭取过来的特务。"此人在上川公司有投資1,100股。另一个特务是季灝，此人是特务头子潘公展的爪牙，曾任上海市伪参議員，是章乃器的外甥，在上川公司有投資495股。还有一个官僚資本家袁国樑，是杜月笙門下紅人，在無錫經营福民面粉厂並在江陰經营利用紗厂，在上川公司有投資1,100股，他与特务陆京士勾結，幹了許多罪恶活动，解放后經群众控訴，全部財产均已沒收。以上三人均在解放前逃亡在外。此外还查有四戶股东，共有投資4,708股，这些人均在国外。依据1952年頒布的"企業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的規定，反革命分子等的財产应沒收，由交通銀行接管。国外的股东，其股份一般亦均請交通銀行代管。章乃器当时身为政务委員，参預法律制訂工作，隐匿敌产不报，显系知法犯法，应从严处罪。

（4）逃避清算，私自結束。　上川公司在1955年底收回了香港房产的卖价，国內的存貨也將近处理完畢，章乃器就在1956年二月私自結束上川公司。他既未召集股东会，又未报告帳目，就自行把上川公司財产估为35,000元，按十万股分配，每股償还三角五分，由章乃器用口头通知办法通知股东繳出股款收据，領回"償还金"。在通知股东以前，他並以"上川公司解放后無業务活动、沒有职員和办事处，現在拟將国外匯回卖房款分配与各股东，收回股票。"为理由，向稅务总局探詢是否要繳納清算所得稅，从而騙取到稅务总局的非正式通知，說明按照他所述的情况，根据稅法規定，可不納稅。据我們調查，上川公司的財产，由于历年的業务活动及香港的房产租金卖价收入，在1956年初远远超过35,000元，他妄圖抵賴是办不到的。

（三）在經济上一貫地反党反社会主义

章乃器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是与他的經济活动相适应的。他在經济上不仅在解放前，一直到解放后的最近还是一貫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們已可从上面这些事实中認識出来。在鉄的事实面前，完全足以粉碎他的無恥謊言。

我們工商界的朋友們在解放后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工人阶級的教育，使我們認識到剝削可恥劳动光荣的道理，在思想上正在走着"破資本主义，立社会主义"艰苦而又愉快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途程，我們的生产資料已經交出，我們正在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在这一过渡时期中章乃器却完全不与我們相同，他在幻想資本主义的复辟。从上面的事例中可以看出，章乃器解放后是一貫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党和政府对于資本主义工商業是一向採取利用限制

改造的政策的，章乃器身为国家高級幹部，他所經营的企業在解放后一开始就隐匿地下，抗不登記，他抽逃大批資金，美其名曰收集古代文物，实际上是把生产資料变为生活資料。在全行業大合营时工商業都已公私合营，他所經营的上川公司却不早不晚就在去年春天私自結束，並未把生产資料交給政府。这証明他是在破坏党和政府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和平改造政策。

还有他在1949年就在人民政府工作，担任要职，可是他在香港担任的港九地产公司总經理的薪金每月港幣1,000元，居然一直領到1950年5月为止。不仅如此，在港九地产公司房屋卖出已有一年另七个月的今天，这一个公司在香港竟还是他負責，还未結束。他除了还幻想資本主义复辟以外，还能有什么解釋？

章乃器的卑鄙無恥的經济活动和違法行为

李 文 杰

右派分子大头目之一章乃器，对偉大的“三反”、“五反”运动怀着很深的反感，他最不爱听別人指出工商界有“五毒”行为，他最討厭民建会、工商联教育会員和工商界爱国守法，他一貫地諱言資产阶級分子消極、落后、腐朽的一面，这不是沒有原因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从解放以来，直到全行業公私合营高潮到来以后，他自己就犯有严重的違法行为。他投資最多的上川企業公司，一貫逃避工商管理，逃避工商稅收，最后，他还隐瞞眞实情况，欺騙蒙蔽稅局負責同志，逃避交眼清算，逃避繳納清算所得稅，目的是抽逃資金，抗拒改造。从經济上看，他的动机和行为是十分卑鄙無恥的，連一个正当工商業者爱国守法这一最起碼的条件，他都沒有具备。揭發他这些卑鄙可恥的經济活动和違法行为，有助于进一步地認識到他的政治品質恶劣，以及一貫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基础和根源的。

章乃器說假話，逃避上川企業公司应納的清算所得稅，抗拒資本主义工商業社会主义改造，隐匿逆产股份

1956年1月20日，正当全国各地工商界鑼鼓喧天地迎接全行業公私合营，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取得胜利的时候，以国家高級幹部自詡的章乃器，滿怀着抽逃資金，抗拒改造的卑劣的唯利是圖思想，花言巧語地在民建会主委办公室对秘書处長王紀华同志和我說：解放前，他在上海、香港經营上川企業公司；解放后，他参加了国家机关工作，这个公司就不再有任何業务活动和賬目，也沒有职員和办事处，也沒有向政府办理工商業登記。他还說：上川公司在香港与別人合作投資的房地产，最近託人卖掉，所得价金（数目若干，当时沒有說，現在知道是港幣六万元）匯回国內，拟分配与各股东，收回股票。他承認自己是上川公司的最大股东，因为在解放初期，拿公司的錢收購古董，这些古董的大部分已捐献与国家，他在这笔款項內不拟受分配。章乃器託我代詢財政部稅务总局副局長崔敬伯同志，歇業的上川公司在国外处分財产，以匯回国內的款項分与股东，要不要繳納清算所得稅。我上了他的当，相信他說的是老实話，沒有深入了解上川公司的真实情况，沒有察覚他撒下了弥天大謊，即貿然代为去函崔同志詢問，犯了便利章乃器偷稅漏稅的錯誤，我应当另向民建会組織上和稅局負責同志作深刻的檢討。崔同志接到我的信后，交局里主管業务部門研究，复函說：按照所述情况，根据稅法規定，可不納稅。我即以原函轉与章乃器。最近，上川公司股东吳蘂梅同志从上海来北京参加反右派斗爭，我和他談起上川公司的事，这才了解到章乃器接到崔同志的信以后，並未召开董事会、股东会，也未向股东报告賬目，而是採取了私人口头通知的方法，关照上川公司各股东向民建会幹部戴家灜（原上川公司职員）家里，繳回股票，領取發还股款（每一股人民幣三角五分）。章乃器並向股东揚言：这件事已向中共中央統战部报告；已取得稅局同意，可不納稅；他解放初期所买古董已捐献国家。很多股东也上了他的当，沒有追問賬目实况，陆續領回股款。有一戶到最近才拿到；还有若干戶一直沒有拿；再有几戶是反革命分子和寄居国外的情况不明的人，按照原政务院公佈的公股公产清理办法的規定，这些股款应当由交通銀行接管或代管，章乃器当时是政务委員，知法犯法，存心代为隐匿，更恐怕交通銀行向他追查賬目，拒不依法陈报，这显然也是違法行为。

最使我憤恨和大吃一惊的，就是章乃器去年1月对我所說的話，完全是謊言。他故意隐瞞事实，为的是蒙蔽稅局，达到逃避交賬清算、逃避交稅，抽逃資金，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法目的。事实証明：解放后，上川企業公司在上海四川路九江路口安利大楼，設有办事处，負責人是夏沂，戴家灜在由章乃器介紹来北京参加民建会工作以前，也是职員之一，去年上川公司發还股款的手續，就是夏沂来北京与戴家灜会同办理的。解放后，上川公司的業务活動是很多的，初步調查了解到的有下列十項：

（一）根据戴家灜交出的上川公司1949年12月31日資产負債表和損益計算書，这一年該公司銷貨旧人民幣一千一百余万元，进貨一千二百余万元，年底存貨九百余万元

（說明1950年必然还有銷貨行为），全年盈余二百六十余万元。据戴家瀛說，以后年份也有賬册表报，留在上海夏沂家（即章乃器原来的住所）。戴家瀛又說：1951年他以中鉛厂噴漆二桶半及鉛笔訂貨單存單向北京中国标准鉛笔厂收回貨款旧人民幣二千余万元。

（二）曾派戴家瀛去蕪湖做米粮生意；投資同成粮行；曾投資經营大儲碾米厂並在蕪湖筹备开办碾米厂；經营拆放款項的交易，賺取利息。

（三）章乃器以公司款項在东北、北京等地收購大批古董，並有卖出行为。

（四）香港房产1955年底卖出，出卖前每月有租金收入，陆續匯回国內。

（五）陆續从香港調回港幣存款，並于1950年接受吳羹梅同志代中国标准鉛笔厂以人民幣在北京归还該厂在香港对上川公司的欠款港幣万余元，沒有按照外匯管理法令的手續办理，这件事已由民建会中常会函請中国銀行解釋，認为这是違反外匯管理法令的行为。

（六）向通俗文化出版社投資人民幣1,000元，由夏沂代表出面，担任該社副經理，該社在全行業合营时併入新知識出版社，夏沂仍留社工作。

（七）以上川公司圖章与温州清明化工厂上海办事处代通俗文化出版社担保，向原中国实業銀行、中国通商銀行貸款。

（八）曾在北京与一家銀号买进景山西街雪池胡同六号房产20間，后来卖出，得价相当于港幣二万元，获利甚多。

（九）曾与崑崙影片公司交涉收回發行影片三种的应收款項，結果如何待查。

（十）曾加入上海市国际貿易業同業公会为会員，有無进出口交易待查。

以上情况証明上川企業公司在解放后确是一个企業單位，就应該依照上海市工商業登記办法、私营企業暫行条例、私营企業重估财产調正資本办法，以及工商業税暫行条例等有关法令的規定，向当地及中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局，办理工商業登記手續、财产重估調正資本手續，並繳納营業有关的各种捐税。现在根据我們向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上海方面了解的結果，上川公司並沒有这样做，因此是一个企圖逃避工商管理，逃避交納税收的違法的黑戶。最后分配剩余财产与股东，拒不依法办理歇業、清算、交税等手續，这也完全是抽逃資金、抗拒改造的違法勾当。章乃器是主謀人也是主要負責人。

解放以来，章乃器自由支配上川公司的财产，为所欲为，侵損股东权益

解放八年来，上川企業公司从上海、香港調来北京的款項是很多的。据已經調查了解的，有以下几款：

（一）香港办事处負責人甘伯林同志說：他曾以港处余款港幣約万元，分批匯給章乃器，有的通过私商交款。

（二）1950年章乃器从吳羹梅同志处收到償还中国标准鉛笔厂港幣債务万余元，折合旧人民幣約五、六千万元交付。

（三）戴家瀛于1951年从中国标准鉛笔厂收回貨款旧

人民幣27,728,462元存入新华銀行，以存單交付章乃器。

（四）香港房产卖价港幣六万元，于1955年底匯到。

（五）香港房产在卖出前，每月可收租金港幣1,000余元，除須年納当地捐税外，每年可余港幣不滿一万元，六年約計港幣五万元，也是陆續匯交章乃器的，現在香港还存有港幣一万一千元。

（六）上海方面1949年底所有財产，就值旧人民幣二千五百余万元（包括存貨九百余万元），初步了解处分財产所得，达旧人民幣七千余万元，有無款項匯交章乃器，在繼續調查了解中。1951年4月底存貨，还值旧人民幣一亿多元。

以上六項合計起来，章乃器經手收到上川公司調回的款項，为数在人民幣五万元以上，八年来累积起来的銀行存款利息为数鉅大，尙未計算在內。章乃器是在1948年11月离开香港的，他代表上川公司在港九地产公司担任总經理，月支薪水港幣1千元，离开后照支，直到1950年5月才停止。这笔收入又近港幣二万元。根据戴家瀛提供的資料，到目前为止，章乃器共只發还股东人民幣一万七千余元。章乃器在上川公司的投資，佔股本总額38.9%，其他股东佔61.1%。具体数字說明，解放八年来，章乃器自由支配着公司的全部財产，可以为所欲为，而佔股本总額61.1%的股东，到目前为止，只从公司应有現款人民幣五万余元之中分得了一万七千余元。这是很不合情合理的。这是一个正当的工商業者所不应該做，也不願意做的事，而章乃器竟然肆無忌憚地做了。章乃器千方百計地拒向股东报告上川公司的賬目和經济情况，想以一手掩盖天下人的耳目，

这是办不到的。他的丑惡企圖終于被戳穿了。

作为一个国家机关高級幹部，章乃器恬不知恥地在“看看政治行情，打打經济算盤”的信念下，进行买卖假古董的勾当，他是一个不登記、不納税的黑戸

巩天民同志揭露：1948年冬章乃器和各民主党派同志們一道，从香港去东北，从东北来北京，路过沈陽时，只对买进便宜古董，特别感覚兴趣。到北京以后，他逐漸成为古董市場的一位豪客。我和吳羹梅同志向几位古董商人了解到，八年来章乃器从在东單地攤上收买当时仅值旧人民幣一千元的小零件古玩做起（当时古董商代他起个諢号叫“章一千”），逐步提高，后来發展到曾以新人民幣一千元的高价，买进一只商代卣。去年向东四保粹齋就买进了瓷器二、三千元。八年来，章乃器約共購进古董五、六千件，进价約共人民幣五万元，一位姓裴的古董商就和他做过二万元左右的交易。他买的东西，一般都是假貨，这也是从自私自利的动机出發的。他曾向原政务院中財委建議成立古玩出口公司，他是国家机关高級幹部，参加政策法令的討論，他知道六十年以上的古董是不能出口的；他出便宜价錢大批收进假貨准备將来大量出口，可以大賺其錢。这眞是“看看政治行情，打打經济算盤”的具体表現。几年来，每逢星期假日，經常有二三十个古董商奔走于章乃器之門，看貨論价，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国家負担开支的一位部長公館的客厅，儼然成为古玩市場，簡直不成体統。

一位古玩商反映，章乃器曾于1954年以古董1,200件捐与故宫博物院，又曾以假古董一批捐贈和大总会。据估

許，他捐送的古董，約佔他所有的一半，現留家中的，約一千余件，价值約二万余元，其中有些是精品，如一件小提梁卣，現在就值千余元。戴家瀛說：章乃器捐送古董与国家，用的是上川企業公司名义。現在我們了解到，这不是事实，用的还是他自己的名义。古董商卖貨与他，發票上开的是"章先生"。这就証明，章乃器是侵佔上川公司的公款买进古董。他說，这是代上川公司所做的行为，那么就应当有經手賬目交代出来。捐献一批与国家，也应取得股东的同意。在这些方面，章乃器代表公司的行为与私人的行为如何划分，無論如何，他是很难自圓其說的。

章乃器不仅收买古董，而且还有出卖行为。我們已經查到，去年他就向一位古董商卖出瓷、銅器三批，計三百余件，得价1,406元。他蒙蔽派出所，說系私人处分旧貨，取得証明后，逃避了交納临时商業行为税123元（依法按营業額8.8%征收）。这証明章乃器买卖古董，是一个徹头徹尾的黑戶。

再有一件事，充分証明章乃器是一个十分卑鄙齷齪的損人利己的市儈小人。一位古董商曾在他家傳达室里出五元向另一位古董商买进一小件古玩，后来，被章乃器知道了，对买主严厉責問，硬把这件东西拿去，但对于代价則拒不給付。这个古董商向我們說：堂堂一位部長，这样欺凌我們小商人，眞叫我們敢怒不敢言。

章乃器腐蝕国家幹部，並有圖賴行为

前述夏沂与戴家瀛私底下代上川企業公司办理發还股款的手續，章乃器給戴家瀛人民幣五百元，允給夏沂一千

元，先付五百元。章乃器当时任民建会副主任委員，戴家瀛是他介紹过来的專职財务幹事，章乃器以500元为餌，誘使一个国家幹部为一个不法資本家做出見不得人的事，他应負腐蝕幹部的罪責。夏沂也是公私合营企業的幹部，同样不应接受資本家給他的錢。更卑鄙的是章乃器还欠夏沂五百元未付，夏沂在上海生活困难，屡次托戴家瀛向章乃器催索尾数，章乃器竟过河拆桥，拒不照付。行賄不仅有拖欠，而且还要賴帳，眞正是無恥。

綜上所述四端，章乃器所做出的一系列的違法勾当，性質上虽是屬于經济方面的，但已構成違法乱紀的条件，而且充分暴露了他的十分丑惡、十分卑劣的政治品質。章乃器不仅是一个陰毒險狠的政治野心家，是一个怙惡不悛、抗拒到底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大头目之一，是一个只有自己沒有別人、二三其德、口蜜腹劍的坏分子，而且也是一个背信棄义、卑鄙無恥、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的市儈分子。章乃器厚着面皮說，把他的骨头燒成灰，也找不出一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渣滓，我們說，把章乃器的骨头燒成灰，除掉那些屬于資产阶級所專有的最丑惡、最污濁的东西之外，什么別的东西也沒有。

章乃器在民建会內組織反党小集团的陰謀活动

黄凉塵

章乃器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檢討"中說，"我从来不搞小集团，从来也不爭取私人的权利"，"絕不迴事生非，到处点火"。他把自己說得多么清高，多么純潔！这眞是弥天的大謊。最近以来，从各方面揭露出来的事实看，章乃器不仅同章——罗联盟有勾結，而且还在民建会內組織小集团。这个小集团是有綱領、有办法、有行动的。章乃器組織小集团的目的是一步一步地夺取会的領导权，把民建会变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基地。

这里，我仅揭露章乃器在民建会內組織小集团的陰謀活动。章乃器小集团的形成，不是始于今日。解放初期，章乃器就利用他在会內的地位，把他的亲信安置在会內，播下了这个小集团的种子。几年以来，他以他的亲信为骨幹，用封官許愿、略施小恩小惠、蒙混欺騙等方式方法，搜买一些在政治历史上有弱点的人，組織了这个集团，为他効忠；並通过这个集团的成員拉攏一些政治落后、对党不滿的人为他們搖旗吶喊。

根据目前揭發的材料，这个集团的成員有丁国楨、許汉三、楊美眞、林滌非、丁裕長、戴家瀛等人。当然还有一些虽不一定屬于小集团成員，但为他們所利用的人。丁国楨是特务（已被捕），林滌非的政治历史問題至今还未交代，許汉三、丁裕長都是向公安部門进行过登記的分子。仅这些人的政治面貌，已足以說明这个集团的本質。

章乃器为了巩固这个集团，扩大这个集团的队伍，並使这个集团的成員死心塌地地为他効忠，他一方面利用这些成員在政治上的弱点进行收买。如林滌非，曾擅自脫离組織，丢掉新疆工作跑到北京，章乃器不但不加以劝阻，反而对林說"斯大林有一次派千百人到边疆工作，有80%的人都离去，这有什么了不起"。另一方面对他的成員封官許愿，施行小恩惠。如章乃器在主委碰头会議上硬要委派許汉三为宣教处副处長，要提升林滌非为"民訊"独立后的总編輯，並暗中通知林，叫他張罗班底。章乃器还一再催促要撤銷許汉三、丁裕長在1953年因犯錯誤所受到的处分。此外，章乃器还为了他的上川公司結束和逃稅事件私下送了他过去的帳房（現在民建工作）戴家瀛500元人民幣。这是一种賄賂和違反制度的恶劣做法。

章乃器对他的小集团成員的領导，一般是以隐蔽的直綫方式进行指揮，但亦有横的联系，章一再告訴林滌非說，許汉三完全可靠，放心联系好了。許在小集团中成了章的代理人。

这几年来，章乃器利用这个小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陰謀活动，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利用这个集团，在民建会內制造分裂，排斥異己，陰謀夺取会的領导权。

1、章乃器指使他的小集团成員用反对宗派主义为幌子，来排斥会的其他領导同志。章乃器硬說民建会的大权掌握在以黄炎培同志为首的所謂“职教社派”手中，陰謀对黄施以人身攻击，去之而后快。为了达到这个可耻的目的，章乃器不惜唆使林滌非、丁裕長写信（具名的或匿名的）給李維汉部長，反映民建会內有宗派活动，同时还說民建会內的党員支持了这一宗派活动。不仅如此，章乃器还誣蔑統战部在民主党派中“划圈子”，“参加宗派活动”，“扶植某一个派别，压服其他意見不同的分子和派别”。这明明是章乃器自己搞宗派活动，反而說別人在搞宗派活动，这是他一貫运用的做贼喊捉贼的無恥手法。

章乃器又对他小集团成員說：“我在統战部座談会上講，民建工作統战部可以来檢査，統战部工作民建也可以檢査，我（章自指）說到此李部長才軟下来了。”由此可見，章乃器目中根本沒有党的領导。

章又授意林滌非、丁裕長等收集有关黄炎培同志的資料，以便算总帳；还对林說：“总有那么一天，他（指黄）是要垮的。”又說黄炎培同志“来日方短”，意思是黄炎培同志不可靠，只有他才可靠，企圖巩固和扩大他的队伍。章乃器还惡毒地說黄炎培同志是“阿諛奉承的典型”，“个人崇拜很严重”，非反对打倒不可。

2、章乃器挑撥林滌非，說林沒有繼續当选中委，是孙起孟同志在阻撓，指使林向周总理、毛主席誣告这是

“民建內部宗派活动的具体表現”，同时控訴孙起孟同志。章还向林說，这事要通天，通天才有办法。

3、章乃器曾邀請楊衛玉（已故）、王艮仲同志为他調解他与孙采苹的不正常男女关系，但反而打击楊衛玉、王艮仲同志，誣蔑他們利用他与孙采苹的男女关系进行宗派活动。常委会对章的誣蔑已作了結論。

4、在民建二中全会期間，章乃器指使林滌非在中委中进行活动，到处說“会內有宗派活动”，以便在中委中造成錯覚，支持他夺取領导权的陰謀。

5、林滌非对組織要求多照顧，楊美真就說，她無能为力，非打垮“职教社派”不行，煽动这个集团的成員“积極战斗”。

6、章乃器还蓄意破坏領导層的团結，他对李燭塵同志說“施复亮同志在‘三反’之后，准备开除你出会”。后来証明，这完全是章乃器在造謠。

上面仅仅是一部分事实，但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解放以来章乃器为了夺取会的領导权，把民建会变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基地，怎样不惜用各种卑鄙無恥和耍流氓的手段，来破坏团結，制造分裂，誣蔑和排斥不屬于他的集团的一切人，以便大权独攬，为所欲为。

第二，利用这个集团，打击党員和靠攏党的分子，企圖把党員挤出民建会，使民建会脫离党的領导。

这些年来，由于会坚决依靠党的領导，由于会內的党員和靠攏党的分子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章乃器及其小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进行了不断的斗爭，使得这个

集团的陰謀未能完全得逞，但章乃器仍然坚持他的反动路綫，千方百計地来誣蔑党員領导幹部，打击会內党員，企圖把党員挤出民建会，以实現其政治野心。

1、章乃器对參加民建的党員領导同志是不滿意的，經常說"南汉宸的話'很庸俗'，以党員領导者自居"。还說："南汉宸、王紀华虽是共产党員，但他們的品質还不及我。"他就这样来丑化、打击党員，抬高他自己，以此作为他进行活动的"資本"。

2、又如章乃器对于会內信任党的領导的人，都要百般地加以侮辱，特別是在党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后，会內許多同志認为应該加强党的領导，章乃器則說这是"庸俗党的政策"，是"抵消主义"，"依賴思想"。

3、章乃器經常罵党員为"党老爷"，說党員"見人高一等"。他还誣蔑党員領导幹部，如他对他的嘍囉們說：李部長偏听偏信，徐冰副部長是官僚主义者，許滌新副部長是教条主义者；还造謠說：关于"紅色資产阶級"的說法，他曾亲自听到毛主席講同意他的这样說法，陈毅副总理虽然曾經批評过他，后来还是对他作了檢討。他还指使他的嘍囉林滌非在民建二中全会發言，来証实他这一惡毒的謠言。

4、章乃器甚至丧心病狂地反对周总理、毛主席。在职教社四十周年紀念会上周总理講話中提到"知識分子确实需要脫胎換骨"，他就对人說："不要为大人物言行所左右。"最近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發表后，有人提醒他，要注意看，他回答："一个人要独立思考。"他对于毛主席这个偉大講話竟然

根本不以为然。

5、章乃器还指使他的嘍囉們林滌非、丁裕長等向統战部写信（具名的和匿名的）撤回王紀华、陈乃昌兩位同志。曾为章乃器小集团所利用的申仲銘，还写信給統战部要求把科長級以上的党員撤离民建会，並威胁統战部，不这样做就是伤害民主党派的組織独立性。許汉三还發动宣教处全部同志签名，煽动群众来反对王紀华。在这同时，章乃器亲自出馬，一再向統战部惡意夸大王紀华同志的缺点，又說党群关系是"敬而远之"，以遂其打击党員的心意。

6、在民建会內改善党群关系，向党員提意見的时候，这个集团認为时机已到，更是大肆活动，夸大党員缺点，丑化党員，挑撥党群关系，企圖鼓动部分落后群众来反对党的領导。以上这些活动，可以看出章乃器集团为反对党的領导，可以說是利用了一切机会，一切場合，真是無孔不入，他对党的仇恨由此可見。

第三，利用这个集团成員的合法地位，控制宣傳教育机構，散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

章乃器为了实現其政治陰謀，在会內首先就力圖控制宣傳教育机構，他利用他的副主委、宣教委員会主任委員的身份，把他的嘍囉安置到宣教处和"民訊"編輯部，一方面企圖使"民訊"变为"独立王国"作为他們散播政治毒素的工具，一方面通过宣教处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例如：

1、章乃器指示林滌非："民訊"的編輯方針不应受約

事，要大胆一点，什么东西都可以登，不要怕犯錯誤，大不了象学習杂誌一样停刊三月。他还具体指示对于公方代表应該批評；不要写批評資产阶級消極性的文章。他还举例說：关于保定的"保联事件"，据他的調查，錯誤不在私方，而在公方，"民訊"就应該說"公道話"。

2、根据章乃器这个指示，他的嘍囉們一方面在"民訊"上宣傳章乃器的反动言論，刊載反党、反社会主义文章，一方面对于批評章乃器的文章就不刊登。如吳金萃"关于向工人阶級学習什么"这篇反动文章，許汉三主張在"民訊"發表，他又送到章乃器那里去，經章向大公报記者表示，他基本上同意这篇文章的論点，終于在大公报上發表了。發表后許汉三还說大公报就沒有發表过"象这样好的文章"。而北京市委員会一位同志給"民訊"写了一篇关于批評章乃器的文章他們則拒絕刊載。

3、章乃器还通过宣教处，千方百計地推拖不利于他們的工作，而对有利于他們的反动活动的事，就不惜破坏組織紀律去幹。比如对于民建中常会指示各地学習"八大"文件的通知，章乃器公然說：这是形式主义的东西，迟一点發也沒有什么。民建二中全会匯集刊載了批判章乃器的文件，而負責編輯这个集子的林滌非、丁裕長用各种借口把出版时期拖延了三个多月之久。最近李康年提出定息20年的建議，吳金萃發表了向工人阶級学習什么的文章后，許汉三竟擅自通函各地組織，普遍討論这兩篇反动言論，並指示各地組織"不要过早批判"，"不得圍剿"，企圖使这些毒素在工商界中傳播，在各地点起野火。

4、章乃器去年自北戴河回来后，立即召見許汉三，

告訴他人大和政协將改为上下兩院制；又把赫魯曉夫在苏共20次党代会上的秘密报告的內容告訴許汉三（当时这个报告未公开），通过許汉三到处进行反动宣傳。民建二中全会期間，林滌非为章乃器献策，發起在中常会內成立一个理論政策研究委員会，章乃器大为贊評，囑林积極發动工商業者会員签名提案，其目的是进一步从反动理論上控制中常会的宣傳教育工作。

5、整風开始后，許汉三要宣教处的同志把"教授治校"的材料收集起来，許又說：我想鳴一鳴，贊成公方代表撤出合营企業。許汉三在为胡子昂同志提供向統战部座談会發言的材料时，写道："中共党員比国民党官老爷还坏。"譚志清同志看了后，曾將它刪去，但当宣教处重加整理时，許汉三又把这句話加上。当然胡子昂同志沒有用这个材料。由此可見，这个集团無所不用其極来反对党。

6、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許汉三受章乃器指使，竟勾結民建北京市委員会的張煥堯，召开座談会，討論李康年定息20年建議和吳金萃的反动言論。这件事，事前沒有向中常会和北京市会的領导請示，至今也沒有向領导匯报。这更是猖狂的活动。

7、在这次"鳴放"中，章乃器小集团分子林滌非还在北京市反右派斗爭大会上散布毒素，說什么"现在說左的話的人不一定左，现在說右的話的人不一定右"，以混淆視听，为章乃器打掩护，模糊群众反右派斗爭的方向。許汉三則从另一方面进行活动，曾一再煽动李文杰同志在中央統战部座談会上，一定要就会內党群关系發言，批評陈乃昌同志有"特权思想"。

8、在民建会內，章乃器也採用这一套方法来鼓动、点火。他对李文杰同志說："文杰兄，你这人在上海时比現在神气得多，能說能写，現在为什么这样萎巴巴的，抬不起头来。"他又問王季深同志，上海肃反情况怎样，並指着王季深說："季深，肃反的偏差，你回到上海要多写文章，要大肆宣傳。"

除揭露章乃器以上罪行外，章乃器还利用他的小集团分子为他鼓吹捧場。說章乃器如何对工作認眞負責，看文件如何仔細。說章不要"照顧"，在粮食部要大家以党員部長的标准要求他自己。許汉三更替他宣傳說，章乃器工作能力强，比好的共产党員还强，並且津津乐道章乃器怎样在粮食部經过斗爭才有职有权。許又造謠說，章乃器在粮食部領导方法高明，中共党委派人到粮食部了解章的領导方法，以便推广經驗。許汉三还对章乃器批評人民日报嘖嘖称道，說章乃器肯独立思考，有見識。

朱德禽同志到京后，許汉三曾一再邀約他到章乃器家里去走走，他还曾邀过程杏初同志到章家去。吳大琨同志和章乃器一直是有斗爭的，但吳到京后，許汉三曾兩次走訪，約吳到章家去，並且說章乃器已經有改变了，想为他們調和关系。

反右派斗爭开展后，許汉三还到处宣称章乃器是思想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沒有什么了不起；即使粮食部長不当，还有汽車可坐，洋房可住。許散播这种毒素，示意小集团成員，章乃器是垮不了的，不要怕，要頂的住。

章乃器說，他的錯誤只是"思想理論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他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試問：上面

这些事实，难道不是政治行动嗎？难道还不足以說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嗎！我們正告章乃器，他說"我从来不搞小集团，从来也不爭取私人权利"，"絕不遇事生非，到处点火"，这些謊話能逃得出全国人民雪亮的眼睛嗎!?

章乃器在上海"視察"中的陰謀

經 叔 平

右派分子章乃器，在全国人代大会的所謂"我的檢討"是徹头徹尾的撒謊和誣蔑，是假檢討，真进攻。当章乃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惡行动已經鉄証如山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时候，他还在施用早已破产了的伪裝手法，企圖抵賴自己的罪行，誣蔑大家对他的揭發为"众口可以爍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搖"；他还厚顏無恥地說："我始終認为我的問題只是思想的問題；我的錯誤只是理論的錯誤。"說"我絕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到死都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这完全是鬼話，章乃器这样的不老实，这样的頑抗，真是自絕于人民。

我在去年民建二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常会上，曾一度被章乃器的伪裝所迷惑。那时我确是把他的問題看作是思想問題、理論問題，沒有認識到是政治路綫問題（虽然有好多位同志已經提出）。在这次党整風的时候，章乃器就和其他右派分子，假借帮助党整風的机会，更瘋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些右派分子的瘋狂进攻，当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憤怒，遭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击。象我这样的人，也就在这一場剧烈的斗爭中从迷惑中惊醒了过来。現

在我不仅認識到章乃器犯的絕不是什么思想上或只是理論上的錯誤，而是一貫地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具体罪惡活动的。在他的所謂"我的檢討"中說"我經过深刻檢查，我同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沒有任何共同之点"。他还說"我的言論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是毫無相同之处"。毛主席提出了六項标准，作为我們辨别香花与毒草的标准，章乃器竟然狂妄地也来一个六点进行詭辯，这就是他向党向人民继續进攻。

正因为章乃器不是思想問題，不是理論問題，而是政治行动問題，所以我不准备再来批駁他的思想和論点，而是要揭發他反动活动的事实。

1956年5月底，章乃器来到了上海。他是以全国人民代表的身份"視察"而来的，我那时在上海市工商联工作，起初听說他要視察上海市民建和工商联；后来說不視察了，只要求同兩会的領导層的同志們見見面，談談毛主席所講的"十大关系"。还說要在座談会講一講，如何帮助上海工商界"破資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由于他是兩会中央的領导人之一，准备談的是毛主席的"十大关系"，又是說帮助我們"破資本主义，立社会主义"，那天座談会的出席率相当高，几乎兩会的市級委員都出席了这个座談会。

所有的委員們是抱着万分热情来听傳达毛主席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而章乃器又是怎么談的呢？一上来，他就說他最反对在內部会議上講話用發言稿，这样談才能真正亲切，有感情。这是一个花槍。这样做他就能官鹽里面夾私鹽，歪曲毛主席的話。他所指的"感情"，当

然也就是資产阶級的感情。他並不是眞实地將毛主席的“十大关系”一一傳达的，而是东拉西扯，使人不知道哪句話是毛主席講的，哪些話是他自己的話。

那天他是如何陰險惡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呢？他是以“民主自由”这个題目开場的。他說高潮之后，对进一步發揚民主自由具备了条件，並說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民主自由，接着就談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相互监督。他特别强調各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他还用譏笑的口吻說，有些人要把党的政策“打折扣”，紧接着他就說工商界沒有抬起头来，有自卑感，所以“积極性”沒有發揮。說到这里他有声有色地介紹了他在粮食部担任部長，有职有权是与党員經过不断的斗爭才得来的，同时声色俱厉地誣蔑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說党員是人民的勤务員，不是老爷，党与非党应該是平等的，不平等就沒有民主。又說他向来主張人家發牢騷，鼓励人家發牢騷，这是他視察的秘訣，人家牢騷越多，他的本錢越大。又說工商界在徹底敞开方面只敞开了一半，即自我批評的一半，沒有敞开批評的一半（說到这里，他又惡毒地煽动了一下）。說有人怕講了話，党員記下来找机会斗一下的日子已經过去了。这就是他对毛主席講的十大关系的体会！这就是他所称的为帮助大家“破資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在以上这一段話中，他施放了多多少少的毒素呀！他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进行惡意攻击；在工商界中鼓吹資产阶級民主，挑撥工商業者与党員和公方代表之間的关系，煽动工商業者不要怕，尽管發牢騷，尽管向党員和公方进攻，章乃器这些充滿了毒素的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攻击的言

論、行动，只要不是有意顚倒黑白的話，如何还能說成“我参加各項工作，各次会議，以至到各地去視察，一貫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覺帮助領导上解决問題，而絕不遇事生非，到处点火”，这不是遇事生非，又是什么？这不是点火，又是什么？这不是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具体行动，又是什么呢？

章乃器在那次座談会上还談到民建和工商联兩会的工作。因为他是兩会的領导人之一，我們滿心希望他能給我們作一些工作上的指示，使我們能更好地协助政府进行对私改造工作，而他又是那么說的呢？他說工商業者的积極性沒有得到發揮，头沒有抬起来，是与兩会的領导作風有关的；兩会領导上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宁“左”毋右的作風，並且民建中央領导上有神秘主义，个人崇拜和宗派活动，他並且說要在民建二中全会上提出进行檢查。这还不是在散播抗拒改造，取消思想教育和学習任务的毒素么，又是什么呢？这不是挑撥煽动，又是什么呢？这不是遇事生非，又是什么呢？这不是点火，又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又是什么呢？

章乃器在上海散播毒素之后，又到杭州，同样的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在工商界进行点火。根据各地最近揭露的材料来看，不仅在以上兩个地区，还在其他地区亦同样利用視察之名向工商界进行点火；不仅如此，身居国家粮食部長竟然在农民中污蔑国家的粮食政策和土改政策。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都是他亲身做的，亲口講的，而他竟然还在所謂“我的檢討”中說“一貫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覺帮助領导上解决問題，而絕不是遇事生非，到

处点火"，真是睁开了眼睛說瞎話，厚顏無恥的抵賴，耍無賴的手法。

現在再看他在各种会議上又是如何的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大家已揭發了不少，我也只举几件事。

1955年11月全联召开一屆二次执行委員会会議，在会議前夕，与会的同志听到了毛主席的諄諄教导，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啓發，开始明白了認識社会發展的規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这次会議上，很多委員开始学習运用批評与自我批評的武器，在思想上进行自我檢查，真是从心里傾吐出对剝削可恥的初步認識。这次会議是全国工商联历次会議中收获最丰富、效果最大的一次会議。但身居副主委的章乃器在听到刘念义（刘鴻生之子）在小組中暴露刘氏在解放前是如何依靠剝削起家的經过。理該加以鼓励，而他却不但未加以鼓励，而对刘念义同志說"你要实事求是"。为什么一个資本家認識到剝削可耻而承認剝削起家，章乃器要說"你要实事求是，"难道說要大家跟他講"中国的产業家的确有部分人存心並不是唯利是圖，而是想做一番事業的"的荒謬話嗎？这不是破坏改造又是什么呢？这不是反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

也就在这次会議期間，当时分組討論对明确剝削，明确社会主义前途等問題逐步深入展开后，小組長匯报中紛紛反映时間不够，要求延長分組討論的日期，其余的主副委都同意延長，唯独章乃器反对，他的理由是"大家水平不同，不能希望太多，馬列主义也不过这几件大事，时間不能再拖……我看不要那么紧"。消灭剝削是我們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馬列主义的确是不过这几件大事，因此我們感到能討論深入一些，对进一步接受改造有好处，章乃器为什么偏要說成"不要那么紧？"为什么要千方百計的阻撓工商業者来談剝削可恥呢？这不是反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

再有也在这次会議期間，在一次正副主委碰头会上討論閉幕詞和决議的时候，章乃器又是这样說："毛主席召开座談会主要是要工商界抬起头来，在下面傳达时要起到这个作用。目前工商界問題是有自卑感，抬不起头来，工商界是公民，有公民权，完全可以抬头，应該把这个抬起头的問題在閉幕詞中談一談"，这不是歪曲毛主席的教导，又是什么？这不是挑撥、煽动，又是什么？

仅仅从以上几件事，难道还不够証实他所說的："我参加各項工作，各种会議，以至到各地去視察，一貫地都是以主人翁的自覚，帮助領导上解决問題，而决不遇事生非，到处点火，"完完全全是鬼話。他是从未放过任何場合，任何机会，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

再有，他說"我坚信党和国家的强大，决不相信，匈牙利事件会在我国發生，而且从来也不打听学生可能鬧事的消息，如果檢查我的思想的片面性，那只是片面的乐观，而决不是什么悲观。"学生鬧事的消息章乃器打听了沒有，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我可要揭發章乃器为什么在整風运动开始不久，打听上海工厂鬧事消息？在全国工商联秘書長会議期間的一次正副主委碰头会上，章乃器就向我打听过，他还叙述了上海有一家針織厂，工人鬧事，党支部書記和工会主席被工人們捆了起来，他是談得如何活

龙活现，象身历其境一样，他問我知道不知道，我回答不知道。从这一件事来說，他哪里是什么片面乐观，而是唯恐天下不乱。

章乃器向小商小販肆放毒素

袁松亭

党为了更好地領导全国人民进行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更好地領导全国人民由胜利走向胜利，号召我們党外人士帮助党进行整風，这是史無前例的。可是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章乃器、張煥尧、吳金萃、閻少青、刘一峯等却与我們完全相反，他們利用党整風的机会，大肆發表謬論，散播毒素，到处挑撥、点火，猖狂的向党进攻，企圖夺取工人阶級的領导权，达到資本主义复辟的罪惡目的。

現在我談一下北京市小商小販受右派分子影响的情况。全行業公私合营后，小商小販一般地都积極的經营，改进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質量，为进一步地接受改造創造条件。他們的心情愉快，坚决跟着共产党走，这是肯定的事实。可是自右派分子章乃器等的惡毒謬論發表以后，小商小販中有一部分人就受到了很不好的影响。例如：（1）关于向工人阶級学習的問題，我們認为向工人阶級学習，是肯定的，是根本問題。可是右派分子的謬論發表后，在小商小販中就产生很坏的影响。有人表示說："向工人阶級学習沒問題，但具体到我們商店就沒有什么可学的。"甚至說："工人还不如小業主呢，还得由小業主帶动工人呢，"等謬論。（2）关于公方代表問題，自右派

分子的謬論發表后，在小商小販中也起了很坏的影响。有人就表示說："公方代表不懂業务，水平也不那么高。"等等。有的为了提高个人威信，即打击公方代表。甚至有的店过去迫切要求公方代表去領导，現在当公方代表下店后，連办公桌都不給准备。（3）章乃器提出"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的謬論后，有一部分人在思想上是同情的。比如，有人說："章乃器說的对，定息是不能算剝削。""我們拿不了几塊錢，更不能算是剝削"。（4）有的自負盈亏戶或共負盈亏戶过去迫切要求定股定息，进一步接受改造，可是自右派分子章乃器等謬論發表后，就增多了消極因素。在定股前首先要求条件，要求过高的工資等等。也有的要求过高的所謂照顧，达不到他的慾望就要求退出單幹等等。有的攤商过去服从市場管理的，現在也有的不願服从市場管理等等。

以上的一些情况說明章乃器等的謬論对小商小販的影响是很严重的。这証明了章乃器的手段是非常毒辣的，他利用陰險毒辣的手段拉着工商界倒退，破坏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事業，企圖达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現在摆在右派分子章乃器等面前的就是兩条道路，一条是徹底交代，低头認罪，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寬恕你，这是活路。另一条就是自絕于人民的死路。由你們自己选擇。

我們北京市的小商小販要坚决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線，斗爭到底，不胜利，决不收兵。

章乃器的反动言行不容詭辯

王 光 英

章乃器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当大家把他批判的体無完膚的时候，又用了他一貫的兩面手法，在閉幕时拿出篇假檢討。这和他在去年民建二中全会开会时所用的手法是一样的。他什么錯誤也沒承認，而且比去年更加变本加厉地誣蔑党和全国人民。他是假檢討，眞进攻。在庄严的人民代表大会上睜眼說瞎話，大事反扑。这个右派分子的元帅又給我們上了一課，讓我們进一步認識到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頑强性，我們人人有責任对他进行無情的、徹底的批判。

我想就二个問題揭露章乃器的眞实丑惡嘴臉。

一、去年十月中共"八大"会議，总結了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取得兩大革命的胜利的經驗，这不仅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世界無产阶級革命經驗宝庫中的光輝一頁。当时我們有30多位各地工商業者被全国工商联电召来京，进行全联代表大会的籌备工作。各地报紙都在集中报导"八大"消息，各民主党派紛紛發出号召，要求成員学習"八大"文件，而單單看不到民建中央的指示。当我們来到北京下車之后，各地朋友碰到一起，都不約而同相互詢問这件事情，大家都覚得，各地方組織正

在要求民建中央加强領导的时候，而民建中央为什么却毫無动靜。第二天一早，我們籌备委員即推了几个代表（黃魚門、王少岩、王宜之、陈邃衡等）到民建中央一边报到，一边問这件事情的緣故。后来才弄清楚，民建中央負責同志都認为有必要早發通知，而独独章乃器百般阻撓扣着叫發。我們很多人就在二中全会前举行的常委（扩大）会不上提出質問，得到的答复是什么呢？是章乃器对我們的一番侮屌。章乃器說：“大家知道已經批判了形式主义的歌功頌德，拥护号召一番”，“工作上的形式主义也要反对”。号召成員学習“八大”文件，这样大的文件大家不会不学的，“我認为形式主义的东西，迟些也沒关系”。“一定搶先几天，是不是还是有些資产阶級的竞爭性”。他还侮屌說“民主党派的暗流是十二个字：爭权夺利、趋炎附势、阿諛奉承，而且那种样子是不美丽的”，“中国只有一級公民，人是平等的，所以我說这是惡劣作風，应該反对。”我們看看他为了百般阻撓發出学習“八大”文件的布置，散布了多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我們学習“八大文件”是为了更进一步認識到党領导我們走的道路是如何正确和社会主义在中国所取得的胜利，因而更增强我們的信心，更加紧密地团結在党的周圍，来建設我們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何等重要的問題，而章乃器是恰恰相反，我們認为好，他認为坏，他恨一切好事，並从中加以破坏。他不但破坏而且借題發揮，破口大屌这是形式主义、歌功頌德。我們歌什么功、頌什么德呢？我国兩大革命的偉大胜利，人民不应該歌頌嗎？党領导我們翻了身，走向光輝燦爛的前程，这些好事，还不許說嗎？現在我們看的

很清楚了，在这次反右派斗爭中右派分子所[illegible]的“歌[illegible]”派，章乃器早在一年以前就在談了。右派分子章乃器血口噴人的把所有民主党派都說成是：爭权夺利，趋炎附势，阿諛奉承。我們要問，誰在爭权夺利，現在看的很清楚了。他們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就是要搞資本主义复辟，想夺取工人阶級的“令字旗”，他們爭的就是这样的权和利，他們阿諛奉承的是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是向台湾的蔣介石暗送秋波。他們已經得到杜勒斯的嘉奬。我們趋什么“炎”附什么应“势”呢？为什么我們跟着共产党走他就恨之入骨呢？各民主党派应該兴师向章乃器問罪，全国人民也要起来与章乃器算这笔誣蔑賬。他的用心很明显，是用誣蔑手段来孤立党，好得心应手，大事进攻。他辱屌民主党派發出学習“八大”文件的号召，是“資产阶級的竞爭性”，說“中国只有一級公民”，这是有意識的对民主党派的辱屌，对共产党的辱屌，把共产党員与人民划出等級，破坏人民內部团結。章乃器还把共产党員比做“西望長安”中的政治騙子李万銘，說共产党員高人一等。他把人分成兩等，一种人是“全抬头”；一种是“半抬头”，这些还不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鉄的事实嗎？他对人民是仇深似海的。再与他最近的謬論結合起来看，他所爱的、欣賞的是哪些，就看得更清楚了。在民建工商輔导座談会上他首先說同意畢鳴岐的文章，他保荐吳金萃的文件登大公报，並說“如不發表由我負責”。他对上海黃苗夫的文章去信加以支持說：“有人敢打击报复，我要尽棉薄之力，为你撑腰。”他还說李康年的定息20年的建議，有其积極意义。这一切說明，凡是右

派分子都是他的掌上明珠，爱护倍至，他的爱憎界限是非常鮮明的。上海胡世俊揭發他在視察中，到处点火，叫人發牢騷，他並說“你們牢騷越多，我的本錢越大”。他是惟恐天下不乱，好混水摸魚，搞資本主义复辟。章乃器已經說出他的供詞，“你們越發牢騷我的本錢越大”，因此我想到有人要發牢騷，就是給章乃器增加本錢，这就需要猛醒，轉过头来，痛击这只万惡的中山狼！

二、章乃器在“人大”的所謂“檢討”中，極尽誆騙、歪曲、煽动、反扑的能事。他說“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針、政策是沒有任何怀疑的”，是“到死都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說他自己是“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党”。这是在睁着眼睛說瞎話。他在“檢討”中說“民族資产阶級已經沒有兩面性——我沒有这样說过”。好！从1951年到現在，他是在白紙上写了黑字的，去年民建二中全会到今年大鳴大放，談了多少，赃証俱在，还說“沒有这样說过”。請再看看他在去年10月14日写給我的信，他不同意我对他的批判的否定会內記录和招待港澳僑胞国庆观礼团的宴会上所講的話，他說：“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我是在向港澳来客敬酒的时候，私下問你：何以工商联筹委当中还有人主張提出兩面性，这样豈不是取消了毛主席的民族資产阶級肯定是一个积極因素的結論？”这不很清楚說明他是否定民族資产阶級兩面性的鉄証嗎？怎能說他沒有这样說过。他作賊心虛，也知道瞞不过众人的眼睛的，所以假檢討中接着写了：“我的說法还会有錯誤，当繼續檢查改正”。这句話倒是他的心里話。

章乃器反动言行的販卖商畢鳴岐曾說出他們的意圖：

“这是一个根本問題，这个問題爭过来，那一切問題都解决了。”章乃器爭了几年就是想从这个問題来否定阶級存在，否定阶級关系，来否定党的領导，动搖我們的根本，作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理論根据。現在他觉得这个問題严重了，所以矢口否認曾說过民族資产阶級沒有兩面性是有道理的。

章乃器毒辣地在假檢討中說：“定息是不劳而获，而不是剝削——这是过去已經有人肯定：‘工人阶級同民族資产阶級的矛盾已經是非对抗性矛盾，而引伸出来的’。”接下去又說：“毛主席的講演分析了……資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剝削……我应該否定我本来的錯誤說法。”他的意思說有錯誤不是他的，而是“有人”的錯誤，我要問章乃器所指的“有人”是誰？这还不是他一貫的伎俩，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歪曲毛主席的言論，並变本加厉地对毛主席的言論进行誣蔑嗎？全国人民对此絕不能容忍！

章乃器說：“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鑠金’；曾參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为之动搖……在今天我相信：‘真金不怕火’，有了共产党的領导，一定可以明是非。”他的意思不是很明显嗎？他把所有对他提的意見人統統說成是“誣蔑”他的“謊言”，共产党是“偏听偏信”，專听一些“流言”，实际上这是他对党、对全国人民、对全国工商界的最大誣蔑！我們一定要与章乃器坚决斗爭到底。

章乃器反动言論的危害性

王 性 尧

章乃器的反动言論，在上海工商界中，曾引起了很大的危害作用。

当我这次来北京开会以前，参加了上海市工商联一个彙报会（是接待工商界来訪情形的彙报）。在这个彙报中，据商業委員会一位委員报告：有一个資产倒掛的工商業戶，政府已經为他作了安排，他忽然表示不滿意，要求退出公私合营，恢复私营。提出的条件：（1）要銀行貸款作資本；（2）要国营供应貨源，（3）卖不完的貨要国营收購。並且說：如果不讓他退出合营，就要把他薪水提高到多少多少，安排他的家属工作等等。这个人接連来了四次，糾纏不已，对他說社会主义改造的道理，不但不听，反而問道：你們看了章乃器的文章沒有？可見这个人所以要走資本主义回头路，是因为他看了章乃器“文章”的緣故。

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在討論兩面性問題的时候，本来大家都認为資产阶級的兩面性仍然存在的。章乃器的謬論出来之后，大家說不对了，兩面性已不存在了。因而对政校布置的課程發生怀疑，認为政校是教条主义，思想大为混乱，学習情緒大为低落。該校学員黄苗夫对我說：他

們的政校小組討論了章乃器和吳大琨兩篇文章。大家一致拥护章的文章，說吳的文章是教条。只有章乃器真真是工商界的領导者，他的言論句句打中心坎，都是我們要鳴而未鳴的云云。

黄苗夫發出荒謬的“鳴文”，得到章乃器复信，表示为他撑腰。这个右派分子就到处招搖，一再說这是“亲笔的、亲笔的”，並表示他有了这样有力的鼓励，一定还要大鳴大放。于是把第三次“鳴文”印了不少小册子到处分發，甚至發到国外。等到各方面反击右派分子的声势浩大起来之后，黄苗夫才覚得不对了。于是开始作檢討。曾有兩次檢討書寄来，說是中了章乃器的毒素还不自覚。

以上不过是举例。实际上类似这种情况並不只是个别的。在我們这几天看到上海寄来的資料里就列举了不少。

章乃器的反动言論充滿煽动、誘惑的毒素，他是有意識的煽动工商界阶級情緒，鼓舞資产阶級的消極一面，挑起工商界对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反感。这里不必多举例，只就他說的“工商業家問題为什么还是一个兩面性，改造七年了，反动的地主都已經大多数改造成为劳动农民了，何以作为盟友的我們仍然还是兩面性，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这一段話所包含的挑撥煽动的危害性就够严重的了。这明明是看中部分工商界对于“五反”运动还存在某些殘余的不正确的印象，就利用来进行挑撥。我們可以看到，凡是工商界在自我改造过程中必須逐步加以克服的一些資产阶級消極一面的思想意識，只要听了章乃器的反动言論，就都会被惡毒地挑动起来。对于一般落后的工商業者，他尽量提供了反动的理論根据，武裝了他們的消極

思想。于是有些落后分子依恃着这种反动言論，把过去“服从工人阶級領导”，“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等的口号一齐忘記了，有的振振有詞，有的甚至狂妄地發出叫嚣，或者無理取鬧。不但造成思想混乱，而且影响到具体工作，發生种种困难。与党所教导我們的改造方向完全是背道而馳，这在上海工商联最近工作中是实际感受到的。所以我們說章乃器的言論，实質上是在利用資产阶級的消極一面，进行挑撥煽惑，是在拉了工商界向資本主义的老路上倒退。是在破坏社会主义改造事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行为。由于他的政治地位高，和中央接近，所以他的言論很容易使一般工商業者受到迷惑，影响特別大，破坏作用也就特別严重。

解放八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实行偉大的和平改造政策，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苦心孤詣地做了不断的努力，才使工商界的思想認識，有了逐步提高的表現。大多数工商業者，能够看清了国家富强的前景，認識到只有服从工人阶級領导，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自己光明幸福的前途。这些成績得来並不容易。作为工商界的領导人物，应当如何珍惜这些已得成績，在党的領导之下，繼續推动工商界，进一步在思想意識上破資本主义、立社会主义，以最后达成个人改造的目标。而章乃器身为民建中央委員会及全国工商联副主委，非但沒有帮助大家在思想改造方面向前进步，反而一貫散布謬論，恶毒的煽动工商界对于进一步改造的反感，在工商界的思想認識上造成混乱。如果不是党及时指出这“是兩条路綫的斗爭”，和社会各方面坚決对右派分子展开反击，

把这一股邪气打了下去，眞不知道他的破坏作用，要發展到什么地步，影响到社会主义改造事業，会受到多少損失呢！

駁斥章乃器的所謂"我的檢討"

馮　和　法

右派分子章乃器經过一个多月来各方面对他的批判、帮助，不但毫無悔悟，而且居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以"我的檢討"为幌子，对党、对人民發动了新攻势。章乃器算是沒有辜負台灣反动报紙称許他"沉着应战"的期望，但全国人民对他这种反动透頂的言行，实在已經忍無可忍了。

我們来把他的所謂"我的檢討"解剖一下，看看章乃器还在怎样繼續他的攻势。

擦脂抹粉是掩盖不了的

章乃器在他的这篇所謂"檢討"中耍尽了無賴手法，他对别人揭發他的鉄一样的事实，一字不提，而还敢厚顏無恥地把他自己打扮成一个正人君子。

他認为他的錯誤只是"資产阶級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風"，但是，仅仅这一些"檢討"也是假的。他不是批評他的个人主义，而是贊美他的个人主义使他能够"脫离泥坑，走上革命"。資产阶級的个人主义能够使人"走上革命"，如果不是一句夢話，那就要看是一种什么性質的革命了。如果章乃器指的"革命"，是要革共产党的命，

革社会主义的命，那是說得过去的。但是，他說："那能設想，一个在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計的威逼利誘之下，都不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那能設想，一个在資本主义的泥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業已經取得如此輝煌胜利的时候，反而要反社会主义？"姑不論昨天的革命者是否今天和明天就必然不会成为反革命，問題是，章乃器把自己打扮得这样花枝招展，是不是真如他所自許的这样一个艳如桃李，冷如冰霜的人呢？可惜的是，各方面揭發他的丑史已經盈篇累牘，而他还在睜着眼睛說瞎話。

章乃器，你为什么不回答大家对你所揭發的問題？例如：你在以"七君子"案件入獄时，叫人打电話給胡子嬰同志給你掩藏你勾結广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的密电本，这是不是事实？你出獄后，为向蔣介石献媚，主張"多建議，少号召"，来反对共产党对人民的抗日号召，这是不是事实？抗战时期你不仅当上了桂系的安徽財政厅長，而且又勾結陈誠，当上了三青团的头子，这是不是事实？你勾結上海銀行，又要挾上海銀行，勒索一笔巨款，来做你的所謂代表民族資产阶級的"新兴工業家"——上川实業公司、上川企業公司的老板，这是不是事实？在重庆組織民主建国会的初期，你就提出中間路綫，来取媚国民党，这是不是事实？解放以后，你还是主張民建会是一个資产阶級政党，要为資本家服务，这是不是事实？……这一系列的丑史，有那些是自命"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的人所应有的呢？你說，在解放前，有"三种威胁經常糾纏着我"。但是除了国民党錯捕了你，使你成为"七君子"之

一、以后你就以此招搖撞騙，作为政治資本外，在解放前你受到过什么政治威胁、在解放前，你除了当大老板，过着荒淫無恥的生活外，有过什么經济威胁，同样，在解放前，像你这样亦官亦商，八面玲瓏的大人物，誰敢来碰你，你有过什么社会威胁。

章乃器說：“許多同我接近过的人都可以証明，我經常是一个革命乐观主义者”。在他看来，“資产阶級的个人主义者”就是“革命乐观主义者”。这是並沒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他所指的“革命”实質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活动，在这里，資产阶級的个人主义者自然可以称为“革命乐观主义者”。所以，他千方百計地要發揮工商業者的“积極性”，就是要資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李康年的定息二十年的名利双收的資产阶級思想，在他看来自然是一种“过急地追求社会主义”。他前几天在人代小組会上不是还說他是“左派”，还应該讓他来發揮反右派斗爭的“积極性”嗎？章乃器很像“封神演义”上的申公豹，臉向背后，我們和他虽然站在一起，他看到的只是后面，而我們所看到的是前面。同他“接近过的人都可証明”，章乃器的所謂“积極性”，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活动。我們同章乃器是站在兩个不同的立場，我們同他的斗爭是兩条道路的斗爭。

至今还繼續施放毒素

如果說，章乃器的“自我檢討”沒有一些“檢討”的味道，那就是不理解他的慣用字彙的原故。在他的文章中，許多“社会主义”在实質上难道不就是資本主义嗎？他一貫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在他的文章中不是成为“忠于党”和“忠于社会主义”了嗎？那末，他的“檢討”本来就不应依照我們对这兩个字的一般理解去解釋的。他在小組会上对他的几个主要謬論發了言，报上說：“章乃器开始認錯”，这未免“委屈”了他，自命“真金不怕火”的章乃器怎肯不繼續“沉着应战”而就輕易認錯呢？

在他的“我的檢討”中絲毫沒有認錯的地方，相反的，他不仅繼續对他的反动謬論进行辯論，而且还进一步施放了大量的毒素。看他是怎样“檢查糾正和澄清”以下几个論点的：

一、关于定息問題。他認为他說定息不是剝削而是不劳而获，“是根据过去已經有人肯定：工人阶級同民族資产阶級的矛盾，已經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引伸出来的”。工人阶級同民族資产阶級的矛盾已經是非对抗性矛盾，我們是在听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議上所作講演的傳达中听到的。章乃器这里所謂“有人”是指誰？他的用意無非是，他所以說定息不是剝削，是根据毛主席关于非对抗性矛盾的話引伸出来的，所以，如果錯誤，責任不在他章乃器。这种含沙射影的手法已經够惡毒了。更可惡的是他下面說到毛主席在發表出来的講演中，指出人民內部矛盾在被剝削者和剝削者之間除了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一面时，他借此又一度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暗示別人說，毛主席的前后說法不同了。

二、关于資产阶級分子和工人阶級分子本質区别問題。他在这里坚持說：“一般对于‘本質不同’的解釋，应該是剝削同不剝削、反剝削有本質的区别”。毛主席明

明是說“被剥削与剥削”，而他还是不承認工人阶級是被剥削的。据我們理解，在阶級沒有最后消灭以前，工人阶級和資产阶級始終是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章乃器在所謂“檢討”中对这个問題只是对他的反动謬論作了进一步的肯定，絲毫看不出有什么“檢查糾正和澄清”的地方。

三、关于官僚主义是比資本主义更危險的敌人問題。章乃器对此不仅輕輕地以“我並沒有說，社会主义必然帶来官僚主义”，来推諉責任，而且嫁禍于人，說：“某些右派分子已經把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甚至‘三害’之間画上了等号”。难道章乃器不是“某些右派分子”的头兒嗎？画上等号的难道不就是章乃器自己嗎？他說：“我的說法容易同他們的說法混淆起来。我应該否定我的說法”。原来章乃器的說法並沒有錯，只是“容易同他們的說法混淆起来”，所以“否定”了他的說法。实际上，这又何苦来！难道章乃器不欢迎所有右派分子拥护（也就他所說“混淆”）他的說法，他不正是这些右派分子的大帅嗎？大帅怎好“脫离群众”呢？

四、关于民族資产阶級已經沒有兩面性問題。他对此輕輕以“我沒有这样說”推脫了事。但是，贓証俱在，白紙上黑字是抹不掉的，他不得不来个当“繼續檢查改正”，以圖繼續狡辯。

五、关于工商業者不經过改造就可以爱社会主义問題。他对此又是一个“这不是我說的”，推得多么“輕松愉快”。請看：“‘工商業家可以爱国，但絕不会爱社会主义’，这种教条主义的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据的”。他是說得多么直截了当！自然，他的手法是“高明”的，到

处打埋伏，随时可以狡賴。既不是你說的，为什么在国务会議上討論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你要起来辯解呢？

請看，章乃器对于他的反动謬論有那些“認錯”和“檢討”？他在为他的謬論繼續辯护中，始終不忘施放毒素，挑撥工商業者对党和政府的感情和团結。他說：“我極力主張縮短人民內部人与人之間的距离，以利于团結和工作”，換句話說，一切批判他的人，他認为是“教条主义者官僚們”的人，就是在扩大人与人之間的距离，不利于团結和工作。他說：“我对于民族資产阶級分子社会主义改造的过分乐观的估計，片面强調提高他們的积極性一面”，換句話說，別人就是对民族資产阶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分悲观”，和片面强調他們的消極一面了。在这篇所謂“檢討”中，大罵“教条主义者”一类的字句是少見了，但是，他的一些遮眼法是大家早已熟悉，怎么也瞞不过人的。

反动言行欲蓋弥彰

大家認定章乃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头子之一，已在全国范圍掀起了对他的声討。对此，他是不可能始終“輕松愉快，心安理得”的，于是，除了一再把自己扮成“革命者”，用“我每天工作和学習的时間，往往超过十小时，为的就是社会主义”一类廢話来作“丑表功”外，就是矢口“呼冤”。他說：“一个犯有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人，他（为什么不用“我”字？——引者）在思想战綫上肯定是屬于右派的。但我經深刻檢查，我同

那些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沒有任何共同之点的。”他明确地否認了自己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思想战綫”是否“右派”，他也是閃爍其辞的。

好吧，就按照章乃器自己所提出的六点来看，究竟是他在睜着眼睛說瞎話，还是別人“歪曲”了他。

第一，他把官僚主义視作比資本主义还可怕的敌人，他毁謗社会主义企業，認为社会主义加上官僚主义，企業的效率比資本主义不如。他一再夸大資本主义的优越，資本家“善于用人”、有“事業心”，反过来不是毁謗社会主义一团糟还是什么？他把我国社会主义事業的个别缺点夸大到比人吃人的阶級对抗社会还不如，还說“沒有夸大国家工作的缺点，抹煞国家工作的成績”。

第二，在右派分子中，他的分工不在学生方面，而是在工商界方面，他不打听学生可能鬧事，难道他就不希望工商業者鬧事？他認为国家沒有以平等人格对待工商業者，“教条主义的官僚們”打击了工商業者的“积極性”，兩面性是政治上的反革命和經济上的“五毒”等等說法，目的不是挑撥工商業者的不滿，希望他們鬧事又是什么？

第三，他到河北、杭州、上海，到处点火，报上已經有不少的揭發，难道都不是事实嗎？他到青田視察，挑撥农民对統購統銷的不滿，粮食部長希望粮食問題出乱子，和另一右派分子曾昭掄，以教育部副部長身份，惟恐教育工作不乱，又有什么分别？他怎么还有臉說自己“絕不過事生非，到处点火”？

第四，他惡意地歪曲斯大林对于党員品質的說法，不仅把党員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一句話，說成是“墻”和“溝”的思想基础，而且，还說：“中国共产党对党員的教育同上述句子是毫無共同之处的”。照他的說法，苏联共产党員和中国共产党員作为党性来說，就沒有共同之处。他說：“毛主席对党員的教导是謙虛謹愼，反对驕傲自滿”，这句話本来沒有錯，但他把这句話和苏联比較，难道不是暗示苏联共产党員就不是这个样？难道还不是挑撥我們的党和苏联的关系嗎？他說他“沒有絲毫違背‘一边倒’的精神”，但他是这样的贊美資本主义，向往資本主义的企業“优越性”，还能說他是“一边倒”向社会主义的嗎？

第五，最近在民建会已經揭露了他不少的“小組織”。整風以来，他支持上海的黃苗夫，鼓励北京的吳金萃，要他們猖狂进攻，难道不是事实？他“夜以繼日地劳动”还能說是为了“对得起党和国家”，而不是反对党和国家嗎？

第六，他根本否定阶級本質的区别，从而否定工人阶級的領导；他把共产党員比作“西望長安”剧本中的政治騙子；他暗示党“壟断”革命理論，把一切正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一概称为“教条主义”；他毁謗統战部偏听偏信，“划圈子”，“参加宗派活动”；他和儲安平的“党天下”謬論合唱，誣蔑党有“大党主义”，而且还是“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他居然还敢說他的批評沒有超出批判“三害”范圍，“而絕沒有涉及全党和党中央的地方”！

章乃器是一个一貫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自从他的反动言行遭到各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他就千方百計地企圖把他的反动活动縮小到思想問題或者理解問題的范圍之內。現在，他再一次掩耳盜鈴地說：“我始終認为：我的問題只是思想的問題；我的錯誤只是理論上的錯誤。”全国人民决不会被章乃器所騙的。反右派分子的斗爭是一場思想斗爭，也是一場严重的政治斗爭，这是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兩条道路的斗爭。右派分子章乃器既然站上台来，向党和人民挑战，自然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回击，現在，他企圖退縮到思想問題和理論問題上去，只是他自己像鴕鳥一样，把头縮到沙中去而已。

甘心自絕于人民

章乃器对于別人所揭露的事实一概置之不理，別人批判他的話只以“歪曲”兩字輕輕推开。在人代会四川小組会上，他公然說民建会和工商联的联合指示是对他的話的“歪曲”，現在，他竟敢在人代会大会上，假借“檢討”的幌子，繼續發动攻势，散播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素。

他在所謂“我的檢討”中不仅把自己洗刷的干干淨淨，並在洗刷自己的时候肆放毒素，而且在他的“檢討”的結束部分，更是陰險万分，又施放了一支毒箭。他誣蔑批評他的人是利用了“众口可以鑠金”、“曾参杀人”的策略，7月10日他給粮食部共青团的一封信中說得非常詳細。他写道：“在民主党派中，有些造謠專家。他們从‘曾参杀人’的故事中取得了‘智慧’，以为慈母对于爱子，

尚且經不起三次同样的謠言，而發生动摇，那末，領导对于幹部，群众对于个人，当然更經不起几次同样的謠言。因此，他們就有組織地、从各方面放出同样的謠言，以蒙蔽領导，欺騙群众”。他誣蔑了全国反对他的人，把大家駡成造謠專家；也誣蔑了領导，認为是輕信“謠言”。章乃器，你究竟是否还有一些人心？

周恩来总理指出：“我們希望，經由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驗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門是对他們开着的”。現在，右派分子章乃器不仅不接受别人对他的耐心的帮助，坚持反动立場，而且还敢在“檢討”幌子下繼續向党和人民进攻，这表明章乃器已經越走越远，不惜自絕于人民。我們为了辨别大是大非，使全国工商業者更清楚地認識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活动的严重危害性，就必須对他繼續进行坚决的斗爭，徹底粉碎他的一切反动陰謀。

（原載7月18日人民日报）

介紹几本反右派斗爭的参考讀物

黄　方　明

为了推进工商界的反右派斗爭，民建、全国工商联及有关部門最近出版了以下几种讀物，作为工商業者在反右派斗爭学習中的参考材料。茲將这几本書簡單介紹如下：

駁斥右派分子章乃器的謬論

柳成群著

本書主要是根据章乃器从解放以来，特别是从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来所發表的言論，来揭露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眞面目。

本書首先揭露了章乃器怎样反对工人阶級的領导，和反对工商界的改造；章乃器怎样誣蔑和反对共产党的領导；章乃器怎样贊揚資本主义、攻击社会主义，为資本主义复辟打开缺口。本書还揭露了章乃器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惡活动的陰險毒辣的手法。最后，本書号召工商業者端正認識，积極参加反右派的斗爭。

本書最近已出了增訂本，增加了有关批判章乃器的所謂“我的檢討”的內容，可以帮助讀者进一步了解章乃器的丑惡面目。（每本定价：0.15元）

工商業者堅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全国工商联宣教处編

本書的內容主要是針对右派分子的謬論，加以批判駁斥，並对党和国家的政策以及有关工商業者改造的若干重重問題，作了比較通俗的闡說。全書包括資产阶級的兩面性問題、阶級关系問題、工商業者向工人阶級学習問題、公方代表制度問題以及贖买、定息和剝削問題等，每个問題都有較系統明确的闡述和对錯誤思想的批判。同时，本書对工商業者怎样帮助党整風，坚决向右派分子的陰謀活动作斗爭，以及反对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和培养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等問題，也作了比較詳尽的闡述。

本書系由各有关部門同志分别执笔寫成的，可以作为各地工商界短期講習班、業余政治学校等的补充教材，也可作为工商業者政治学習的参考讀物。（每本定价：0.15元）

工商業者政治理論学習参考讀物

經济資料編輯委員会編

本書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內容：（1）工商業者应如何認識和对待爱国主义、人民民主、工人阶級領导、資产阶級的兩面性、贖买政策及公私共事关系等問題；（2）工商業者应如何認識和对待政治理論学習、自我改造、团結互助、爱护公共財产等問題；（3）关于工商業者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發揮积極作用等問題；（4）关于五反、自由市場、工商稅等問題；（5）关于工商界骨幹分子的作用及工商界青年的进步和改造等問題。

全書共計21篇，由各作者根据当前工商業者的思想情况和他們所关心的問題編写而成，可以作为工商業者进行

政治理論学習的补充讀物或者选作补充教材。（定价：0.32元）

以上各書均由財經出版社出版，由新华書店發行。各地讀者如有需要，請向当地新华書店直接联系、購买。

此外，民建中央宣教处編印的“批判章乃器反社会主义思想專輯”及民建、全国工商联兩会临时工作委員会編印的“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已出兩輯），目前已發至各地組織及民建委員。这三本小册子系統地介紹与批判了章乃器解放以来，特别是整風以来的反动言論，可作为工商業者在反右派斗爭中的参考。